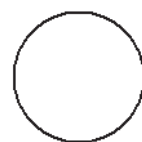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一九五九年

13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五九年第十三期 ★

目 录

学会更好地计算经济效果 许辛学 (1)

充分利用工业生产的潜力

.....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社论 (5)

共产党员是劳动人民的儿子 洪 禹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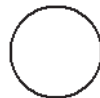
依靠群众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 冒第君 秦率震 陈立言 (16)

速度快 质量高 曹萍铭 (20)

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援助” 顾以信 (25)

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 陈伯达 (33)



学会更好地計算經濟效果

許 辛 学

社会主义制度同过去的一切社会制度相比较，是最能够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制度，它有利于我们在发展工农业的生产和建設中，取得最大的經濟效果。在解放以后，我国人民只用三年的时间，就恢复了被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經济，使工农业生产超过了解放以前的最高水平；接着，我国人民又用五年的时间，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使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我国这个事实，在全世界面前再一次地証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我国国民經济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党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总方針。这条总路綫、总方針，要求我們能够更合理地用同样的資源和資金，进行更多的生产和建設，使生产和建設发展得更快更好；要求我們不断

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地改进質量，不断地降低成本，最大限度地节约每个单位产品內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因此，我們就必须在一切經濟事业中認真地做好經濟核算工作，充分发挥經濟效果。人們已經看到，我們在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創造性，改进生产技术，增加产品产量，提高現代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績，积累了不少的經驗。但是，如周恩来同志在今年四月十八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說，“我們建設社会主义的时间还很短，实行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时间更短，我們的經驗还很不足，工作中的缺点还不少，必須繼續虛心地学习，沒有任何理由自滿。”而且，随着經濟建設事业的不断发展，原有的問題解决了，必然会出现新的問題，需要我們去解决。

我們的任务既然是不断地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不断地改善人民生活，那么，一切方面和一切部門，一切企业单位和一



切人民公社，以及一切經濟工作人員，都应当在自己的工作中，十分注意發揮經濟效果。这里，我們提出当前大家共同关心的几个問題来討論一下。

在基本建設方面如何貫徹执行多快好省的总方針，如何發揮經濟效果，陈云同志在“当前基本建設工作中的几个重大問題”一文中，已經作了詳細的論述。他曾經說到，基本建設項目要分別輕重先后进行排队，这就是一个关系到發揮經濟效果的重要問題。我們的建設規模一年一年地在扩大，需要建設的項目很多。但是，在一定的時間內，建設的进行不能不受到資金、材料、設備的制約。假如不很好地考慮資源、材料、設備等条件，不很好地考慮到劳动力的适当安排，不分輕重先后，而把力量分散使用，就会使許多建設項目不能在短期內投入生产，使投資不能迅速地發揮效果。反之，如果我們很好地照顧到資源、材料、設備、劳动力等条件，适当地有计划地集中使用力量，建成一批，再建一批，那就能够把我們需要的項目分期分批地建設起来，尽早地把投資效果發揮出来。当然，要达到充分發揮投資效果的目的，在进行基本建設的时候，还必须根据資源、运输等条件和国民經济的需要，具体地研究应当先集中力量建設的是些什么項目，其中大型的是多少，中小型的是多少，那些采取現代的技术，那些采取簡易的技术，以及它們如何布局、如何結合等等問題。忽

視对于国家工业化有決定作用的骨干工程，把資金过分地分散用于中小型工程，特别是用于那些資源缺乏、运输困难和将来生产中消耗原料过多、产品质量不能保證的工程上面，因而不能很好地發揮投資效果，这是不对的。另一方面，輕視中小型企业 and 簡易技术，不注意發揮它們在可能条件下能够發揮的經濟效果，同时，不适当地把国家投資过多地集中在少数大型的現代化工程上面，因而不能迅速發揮投資效果，这也是不对的。

工业生产的增加和基本建設規模的扩大，是主要地依靠大量增加新的职工，还是主要地依靠改善劳动組織、改进技术，从而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另一个关系到發揮經濟效果的重要問題。我們的国家还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必須大規模地建設新的企业，扩建旧的企业，因之也就需要相应地增加工人的数目，当然，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我們必須切实注意遵守經濟原則，也就是说，要根据每个人都能够充分發揮劳动效率的原則，来合理地調配各个方面的劳动力。正是在这个問題上，有些同志的認識不是很明确的。他們不了解經過多年的經濟建設，我国城市中的失业現象已經消除，工人階級的队伍已經空前扩大，可以担負起当前的生产、建設任务；他們也不了解我国虽然有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資源，但是因为农



业生产还没有实行机械化，还缺乏化学肥料，要迅速提高农业的产量，农村劳动力已经不是感到过剩，而是已经开始感到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过多地把农业战线上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战线上来，对劳动力的安排不注意工农业并举、重工业并举，是不适当的。因为那样做，一方面将妨碍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轻工业的相应发展，另一方面将妨碍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品成本的降低，并且将过分地增加工资的支出，使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同生活消费品的增长不相适应。

全国解放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技术水平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总的说来，工业劳动生产率还不高，提高的可能性还是很大。如果我们不主要地从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去打主意，而只是简单地想到增加职工数量，那就不能按照劳动力统筹兼顾的原则，使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社会生产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就难以贯彻执行党的多快好省的总方针。

在基本建设方面和工业生产方面，再一个关系到经济效益的重要问题，是兼顾数量和质量的问題。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工业产品不仅数量发展得很快，而且质量是不断提高的。许多企业的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加以注意，做好工作，数量和质量是可以同时跃进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思想上有片面性，就会或者发生

质量提高了而数量增加不多的现象，或者发生数量增加了而质量降低的现象。无论发生那一种现象，都不能使我们取得应有的经济效益。有一些同志却有一种不正确的看法，认为解决了数量问题，也就解决了经济效益问题，而不认识质量的好坏对于经济效益大小的关系。比如，一个企业生产了一万个单位产品，全部合乎质量标准；另一个企业生产了一万二千个同类产品，可是其中合乎质量标准的只有八千个，其他的四千个，或者是次品，或者是废品。以这样两种情况作比较，究竟前者经济效益大，还是后者经济效益大，不是很清楚吗？质量的好坏密切关系到经济效益的大小，不也是很清楚吗？上面是就工业生产方面说的，至于说到基本建设，如果设计不合理，工程质量不好，有的就要返工，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有的会使企业的生产长期不合理，或者影响到产品质量的提高，造成更大的浪费。而这些，正是我们应当竭力地避免的。

我们还要说一說农业的生产。在最近期间，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还是提高全部已耕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并且尽可能扩大播种面积，以达到农业上的最大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还可以因地，因时，有区别地，有步骤地增加丰产田。但是，要避免那种把大量的劳动力、肥料、种子过分地集中投入少量的土地，因而使



其他大量的土地不能够得到合理經營的作法。至于为了进行科学研究和取得农业增产的经验，在一个生产单位中用几分地或者一两亩地，反复进行多种试验，那是有好处的。

总起来说，在经济建設工作中，每兴建一项工程，每添置一台设备，每增产一种产品，每增加一个职工，每采取一项措施，每支出一笔资金，都必须根据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充分考虑到它的经济效果。这正是党的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的要求。如果根本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经济效果的大小、快慢，想怎样办就怎样办，以为办了就算完成了任务，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对的。实际上，这种想法是对党的总路綫、总方针的曲解。

党的总路綫所说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要求人们在斗争中，在充分估计客观可能性的条件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多快好省”，是要求人们在生产和建設中，充分注意发挥经济效果，不断地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前者主要说的是政治，后者主要说的是经济，而政治和经济是完全统一的，政治是为着经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正是为了实现多快好省的方针。我们判断那里的干劲足，那里的干劲不足，那里居上游，那里居下游，当然不应

当以摊子的大小、人员的众寡、花钱的多少为标准，而应当以经济效果的大小、快慢为标准。也就是说，应当以是否完全实现多快好省为标准。那里用最少量的消耗取得最大经济效果的，那里才是真正鼓足了干劲，真正居于上游。

当然，要在生产和建設中充分发挥经济效果，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是要积累大量的经验才能够逐步做好的。对于我们经济工作人员来说，重要的在于采取对社会主义建設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認真学会精打細算。也就是说，要对自己所管的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的分析，經常找寻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的关键問題。在解决这类問題的时候，应当考虑各种方案，经过群众討論，認真地加以比較，选择其中最合理的方案，付诸实行，并且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加以修正和补充。同时，要建立和健全有关经济核算的各种合理的規章制度，如定期进行经济活动分析，加强成本管理，制定必要的技术经济定额等等。我们在计算经济效果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本单位的内部状况，而且要考虑同本单位有关的外部状况；不仅要考虑目前的效果，而且要考虑将来的效果；不仅要考虑局部的利益，而且要考虑整体的利益。一句话，要瞻前顧后，要照顧局部和全局的统一。



充分利用工业生产的潜力

·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社论 ·

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一九五九——一九六五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按其规模说来是整个苏维埃计划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这些数字极其生动地表明我国正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只要指出下面这点就足够了：今后七年内工业产品的产量，将等于我国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的整个时期内所生产的工业产品总产量。可以根据以下的事实来判断工业生产增长的情况：一九三二年工业产品增长百分之一，以现在的价格计算，为八亿卢布，一九五九年为一百一十亿多卢布，而一九六五年则将超过一百九十亿卢布。换句话说，七年计划最后一年的生产总额，以数字来表示，几乎为二万亿卢布。而且在一九六五年，工业产品增长额的四分之三将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取得；在七年期间，每个工作者的生产量应当增加百分之四十五到五十，如果把缩短工作日考虑在内，则产量的增加还要多些。这就是说，产品增长额大部分将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工艺规程以及生产组织的进一步完善来取得的。

基本建设投资的[○]任务也是宏伟的。仅仅国家的投资在七年内就为二万亿卢布左右，而全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将接近三万亿卢布，即大约等于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历年投资额的总和。这样巨大投资的主要来源是国民经济的内部积累，而在建立这种积累中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各种消耗的节约。节约劳动消耗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除节约物质资源外，节约劳动消耗可以大大降低生产费用。仅仅在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国营农场内减少生产费用，就可以节约大约八千五百亿卢布。

七年计划的鼓舞人心的数字使苏维埃人产生应有的自豪感。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也就自然会考虑到：如何更好地保证完成七年计划，要超额完成七年计划有哪些可能性。正如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决议中所指出的，七年计划的根本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经济竞赛中最大限度地赢得时间”。

而超额完成计划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竞赛中赢得更多的时间，加速七年



计划根本问题的解决。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给苏联工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贺词中指出：“目前苏维埃工会的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是，动员广大劳动群众为努力实现党的第二十一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而斗争，为提前完成七年计划和一九五九年（七年计划的第一年）的任务而斗争。”

• 我们祖国全体劳动者都参加到争取提前完成七年计划的社会主义竞赛中来。列宁格勒机器制造业工人和仪器制造业工人，保证要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总产量计划和完成超计划产品一亿卢布。为此就要改进产品的设计，使设备现代化，采用流水作业法，更好地利用金属，等等。仅仅组织铸造、工具、电极、坑木以及其他大量生产的产品专业化生产一项，就可节约五亿卢布左右。

千百万群众展开了争取提前完成七年计划的运动，这个运动旨在更充分地挖掘国民经济内部的潜力，以使用最少的消耗，生产最多的产品。苏维埃劳动者——共产主义建设者非常关心这件事，他们不断地发挥自己的创造积极性。劳动者福利的增长也同动员潜力有直接的关系。大家知道，七年计划规定，工人和职员的实际收入（按每个工作者计算）将平均增加百分之四十，同时大大提高最低工资和公共服务事业的开支，缩短工作时间，建设大量住宅和生活服务机关。我们愈深入地挖掘和利用现有潜力，那么劳动者福利提高的速度就愈快。

要最充分地动员生产的内部潜力，就

得克服许多严重的困难，解决许多新的任务。七年计划在这方面规定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措施。但是，无论在哪个计划里，尤其是在远景计划里，决不能预料到可以用来为国民经济服务的全部潜力。群众的生动的创造性活动以及他们日益提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及时挖掘和实现生产发展的一切可能性创造着必要的条件。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必须更充分地挖掘各企业的内部潜力和可能性，以便在现有生产能力的情况下增加产量，不断改进工艺规程和生产组织，改进对设备、原料、材料的利用。

积极动员生产潜力乃是我国生产力增长的补充泉源，实质上是取之不尽的泉源。潜力的利用同技术的进步、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改进有关。利用潜力有助于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经济为动员潜力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这首先是计划经济制度，这种计划经济制度可以对潜力进行系统的研究，可以采取在生产中利用这些潜力。我国社会巨大的优越性还在于：人们对劳动和公共财产采取新的社会主义态度；劳动者有广泛的可能性来不断改进生产。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方法取得特别巨大的成就。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农业工作者会议上说：“……我们由于改组管理而在工业中所获得的一切成就，按其规模和意义来说，大大地超过了我们在开垦荒地方面的工作。在工业中（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不是两块、三块荒地，而是更多的荒地……”，如果“把不可胜数的潜



九二。显然，如果大多数企业达到了馬格尼托哥尔斯克鋼鐵联合厂工人这样的指标，那么国家就会額外地得到大量的鑄鉄。

我們还可以举利用黑色金屬（这是最普遍的一种物質資源）为例。节约金屬可以大大增加机器制造业产品的产量，更好地保証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国民經济其他部門获得金屬。据統計，我国的机器制造工厂每年在鉋屑废料方面所損失的金屬达四百五十万吨左右。这些废料所造成的損失总共为二百五十亿卢布。鉋屑有时竟达金屬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已經給国民經济带来很大利益的各种节约金屬的方法是众所周知的。我們不妨举出各种节约鋼材的出产，压鍛、模压以及各种精密鑄造的采用，等等。在波多尔斯克机械工厂，据統計，由于建立了精密鑄造車間，仅九种零件的节约每年就达一千万卢布。例如，制造縫紉机的梭子，从前需要六十三道手續，而且鉋屑达到金屬的百分之八十；当精密鑄造时，手續减少到三十六道，废料也不多了，劳动生产率几乎提高了三分之一。

用压鍛法代替机械加工，可以节约金屬百分之二十五，騰出許多設備，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塑性变形法是非常进步的方法，这种方法暂时还没有在工业中得到充分的传播。然而采用这种方法来生产象鑽子这样普遍的工具，就可以节约金屬百分之三十到四十，騰出大量車床，可以使生产面积减少三分之二。要知道，許多其他产品也是可以这样来制造的！

在机器制造业中，所需要的全部金屬的百分之八十五，是用来生产大零件——机座、动力架等。在这里，节约的可能性（例如，用鋼筋混凝土代替鋼結構）还利用得很差。在科洛姆納車床制造厂曾建成了机座长达三十二公尺的一个龍門鉋床，它的大零件是用鋼筋混凝土制成的。这个車床所用的金屬共一百二十吨。如果它全部用金屬制成，則必須是三百六十吨。据統計，机器制造业中采用鋼筋混凝土，每年至少可以节约金屬消耗达二百万到三百万吨。縮减机器制造业中不必要的安全系数，包含着特別巨大的节约的可能性。例如，烏拉尔車輛厂由于明确規定了安全系数，便使有棚貨車的重量减少六百公斤，它的載重量則从五十吨增加到六十吨。

对于修复各种机器和机械的破損零件的可能性，我們还利用得很差。而这种修复的方法則是人們早都知道的。这就是噴鍍金屬、鍍鉻、焊接等。例如，修理采矿設備的卡拉干达机器制造厂掌握了“鋼的硬化”过程，他們用电鍍法（这是一种非常简单、容易做到而便宜的办法）在两、三小时内就使鍍层厚度达一毫米半。广泛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大量节约金屬，并大大延长机器和机械的寿命。

关于必須增加木材（按其意义說来，它是各經济部門的第二种材料）的生产和必須合理利用木材的問題，在我国，人們写的和談的都不少。林业和伐木业組織需要大加改进。这可以使最寶貴的原料的巨大潜力用来为国民經济服务。經驗表明，可



以用比較简单的办法在同一面积上大大增加用材的出产量。例如，彼尔姆国民經济委员会的伐木工人，已經在今年預定用这种办法額外获得大約一百万立方公尺的木材，这就可以至少节约五千万卢布。

对伐木区的废料(树节、树枝、树桩、树皮)和鋸木厂的废料(板皮、木片、鋸屑等)的工业加工，可以挖掘出很大的潜力。目前在火柴生产和圆木生产中剩下的废料很多。这些为数几千万立方公尺的原料白白地丢掉了。然而可以用化学加工的办法由它当中取得各种各样的产品：布匹、工艺酒精(它至今都是由谷物和馬鈴薯制成的)、包装紙板、供住宅建筑和別墅建筑用的以及制造家具用的木屑板，等等(順便說一下，西德甚至从瑞典和芬兰輸入木材废料)：目前已經拟定了一些措施，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經過二、三年，仅仅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就可以把木材废料加工达四千五百万立方公尺。这就可以节约二十五亿到三十亿卢布左右。

在更合理地利用設備方面也有很大的潜力。在我們的企业中还有非常多的机器和机械，由于工作組織得不好和缺乏足够数量的备件而閑置着。例如，彼尔姆省森林工业局就有許多机器沒有动用。拖拉机履带环制造得非常少，履带环一到森林里很快就破損了。自然，沒有这些履带环，拖拉机是不能工作的，而拖拉机停止工作就意味着伐木計劃沒有完成。彼尔姆国民經济委员会甚至計劃在一九五九年年仅仅制造八万个履带环，而对履带环的需要則超过

四十万个。多少設備长期閑置而沒有动用！仅仅在俄罗斯联邦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就有将近六万台金屬切削車床和一万五千多套鍛压設備，无法安装。

消除工作时间的損失，是一个巨大的潜力。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所有企业都有工作时间的損失。各个企业之所以浪费很多工作时间，除了因为它们不注意細微原因、沒有很好地估計到停工和缺勤以外，还因为劳动組織得不能令人滿意以及存在着其他缺点。在許多場合下，这种損失是很大的。为了要消除这种損失，完全用不着采取复杂的措施。每个企业都能够搞好劳动紀律，改善劳动組織和生产組織。

在这方面，下面这个事实是值得提出的：許多年来有节奏地进行工作的問題，并未从議事日程上取消。在这方面，不能說任何工作都沒有做。許多先进企业都能够保証均衡地、正常地进行工作。但是也有許多地方，直到現在还存在着时松时紧的現象。这首先同物質技术供应的严重缺点有关，同不能及时获得一定形状、品种、尺寸、質量的材料有关。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沒有必要的儲备，它就不能按照計劃所規定的質量和期限均衡地生产产品。企业不均衡地生产产品，它們也就不能按照协作計劃供应半制品和制成品，結果，就产生了特殊的“鏈鎖反应”，使其他企业也不能完成計劃。为了改善供应組織工作，改进各个单位(从企业到国家計劃委员会)的供应計劃，还需要做許多工作。但是，正如經驗所証明的，有节



奏的工作多半取决于企业正确的生产組織。例如，莫斯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厂，莫斯科汽化器工厂，乌克兰、列宁格勒和烏拉尔的許多工厂的供应条件同其他企业一样，但是它們却能有节奏地进行工作，这究竟应该怎样解释呢？显然，不是一切都取决于供应。哪些企业有正常的超額生产，哪些企业采用流水作业法，哪些企业的生产技术准备工作做得較好，哪些企业能够对一切生产經濟活动进行系統的分析 and 預防检查，那些企业就具备按照工作計划进行工作、有节奏地生产产品的有利条件。

上述这些例子証明，我們还没有随时随地实现我国由于社会主义經濟制度所創造的可能性。为了保証更充分地發揮工业生产的潜力，从而为提前完成七年計划創造条件，首先应该發揮和大力支持劳动者的創造积极性，改善經濟領導的方式和方法。在这里，党組織、工会、共青团組織和經濟組織有着廣闊的活动場所。

群众創造积极性的提高，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連續不断的過程。现在，对生产潜力进行社会检查，已經在各地普遍展开。許多企业从前也进行过各种社会检查，如设备的检查、工作地点的检查、采用合理化建議的检查、劳动組織的检查，等等。現阶段这种检查的新内容和特点是：全盘检查、检查遍及生产經濟活动的各个方面。例如，由于党組織和經濟組織的倡議，弗拉基米尔国民經济委员会各企业，进行了关于挖掘生产内部潜力的普遍的社会检查。弗拉基米尔拖拉机制造厂，决定在

七年計划的最后一年用节省下来的金屬生产拖拉机。这就是說，必須在每一台拖拉机上节约六百到六百五十公斤金屬。該拖拉机制造厂的全体工作人員正在解决这个任务，检查潜力；在工厂、車間、科室的检查委员会里吸收了专家和生产革新者；編制了消灭“薄弱环节”的具体建議手册；給每个工人分发意見表，讓他們对于怎样在工地上更好地發揮潜力发表意見。全体工作人員都参加了这一工作，并且已經取得了初步的成績。汽車器材厂如果实现检查时所提出的建議，就能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完成本年度計划。靠超計划降低成本，該厂本年至少将节约二百七十万卢布。該厂的工人說得对：“潜力是取之不尽的泉源。”列宁格勒金屬工厂在检查生产潜力时有大批的生产者参加。仅仅采用一部分建議，全年就可节约一百一十多万卢布。

爭取共产主义劳动集体和突击队员称号的竞赛，是社会主义竞赛中新的頁。在这个竞赛中产生了卓越的首創精神。威士尼沃洛茨克棉織联合工厂紡織女工工作队队长瓦林金娜·加甘諾娃(她領導的工作队是工厂中优秀的工作队之一)，以身作则地表现出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她主动要求把她調到落后的工作队去，在一个短时期內，她教会了这个工作队的队员采用先进的劳动方法，因而使落后的工作队一跃而为先进的工作队。現在国内許多企业都来支持这种首創精神。不用多說，这种首創精神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在發揮群众的創造积极性方面，工会



組織的作用正在无比地增长。工会組織的神圣职责是把共产主义劳动队和突击队员的竞赛再提高一步，尽量帮助工人提高文化技术水平，积极支持革新者，改进定期的生产會議的工作。这里充滿了极其巨大的發揮內部潜力的可能性。

工会應該特別注意群众的合理化建議和发明創造。发明和合理化建議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增加。但是不少有价值的建議还没有被采用，甚至还没有經過审查。只要举出下面的数字就足够說明这一点了：在一九五〇年共收到一百二十四万一千件建議，而採納实行的只有六十五万五千件；在一九五八年共收到二百七十万件建議，而採納实行的只有一百六十万件。采用合理化建議的效果是很大的：一九五〇年由于采用合理化建議，大約節約了五十亿卢布，而在一九五八年，大約節約了八十五亿卢布。著名的革新者，基輔“紅色挖土机”工厂的旋工弗·謝明斯基說，我們有充分可能在更好地安排合理化生产的条件下，一年節約五百亿到六百亿卢布。这种說法是完全正确的。

共青团員表现了动人的首創精神。全苏共青团中央和許多經濟組織以及社会团体，共同決定在一九五九年展开农村青年在农业中提出更好的合理化建議和发明的竞赛。爱沙尼亚共青团中央和国民經济委员会，共同組織了机器制造业企业提出更好的合理化建議和发明的竞赛。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建立了“共青团七年計劃基金”，全莫斯科和全省本年已經節約了十亿卢布。建立共青团十亿

基金的思想将会带来巨大的效果。全苏共青团中央所組織的“共青团的扑滿”，在两年內大約已經節約了一百一十五亿卢布。

加强科学工作者和生产者的創造性合作，对于挖掘潜力有着重要的意义。應該坦率地說，这种形式还没有随时随地加以推广。在这里，科学技术协会（工程技术人員、科学工作者和生产革新者自願的群众性組織）應該做許多工作。科学技术协会的任务是促进技术进步，尽量挖掘生产潜力。現在我国科学技术协会已有八十多万會員。善于利用这个巨大的創造力量就能取得很大的成果。

近来許多城市都在召开經濟會議。經濟會議的主要任务是：最充分地利用生产內部潜力，确定利用这些潜力的方法。例如，下塔吉尔的經濟會議研究了用軋制的車廂軸代替鍛造的車廂軸的問題；烏拉尔車輛厂采用这种方法就能騰出二百四十个工人和節約一千一百万卢布。奥尔斯克·哈里洛沃冶金联合厂的經濟會議研究了許多关于更充分地發揮內部潜力的措施，在今年就能节省四千万卢布。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許多企业的职工力求找到一种可以有系統地进行有关改进生产經濟工作的形式。“劳动报”在各个城市举行“星期二座談会”，許多企业同“工业經濟报”共同組織“星期四經濟座談会”，专门研究挖掘生产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的方法。許多企业的定期生产會議、綜合創造工作队的工作都搞得很好。



国民經济委员会对于发挥潜力起着特别巨大的作用。他們首先应该負起改进和扩大生产的責任。国民經济委员会的真正职责是改进計划制度和加强經济核算，这是积极动员生产潜力的最重要条件。

經济领导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这就使挖掘潜力的工作受到了阻碍。例如，測定生产总额和劳动生产率的一些指标，特别是总产值的指标，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許多經济学家建議規定固定基金和流动基金使用效果指标，每一卢布現有基金的产量指标，以及其他一些指标。所有这些問題都值得国民經济委员会和中央計划机关特別注意。采用不准确或不正确地反映实际情况的指标，会阻碍生产潜力的发挥。例如，斯維尔德洛夫斯克国民經济委员会薩馬尔森林工业局，一九五八年的生产計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五，但同时却使国家受到了七百万卢布的損失，这未必能算做成績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該局把所謂一个人每一立方公尺的綜合产量当作主要指标，按照这个指标评价該局的生产活动。而这个指标往往不能反映企业活动的真实成績，因而这种指标在經济上是站不住脚的。

各个企业及其所屬生产单位的計划任务是根據报表材料来規定的，这是一个最大的缺点。不难理解，这种制定計划的方法，好象使报表材料中所反映的損失和非生产消耗合法化了。这里也有着同早就受到指責的、掩盖真实的可能性和潜力的所謂經驗統計定額相同的情形。应该尽量推行在先进企业中行之有效的編制計划的計

算方法，这种方法是以前劳动、材料、工具、电力消耗的技术定額，儲备定額，生产周期的延續時間，以及估計到經济效果而規定下来的各种組織技术措施为基础的。有計划地交流先进生产經驗，在这一工作中起着极大的作用。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这是很大的生产潜力。我們有編制組織技术措施計划的丰富經驗，但是我們还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經驗。什么是組織技术措施計划呢？简单地說，这个計划就是改进技术、工艺規程和生产組織的有目的的一整套措施，这些措施旨在挖掘潜力，尽量利用潜力，为提前完成計划創造实际条件。早就到了总结和推广組織技术措施計划的丰富經驗的时候了。

經济干部的培养，在这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現在我們特別需要熟練的經济工作干部。工程技术干部在經济方面的修养还不够。許多企业簡直没有人能够研究有根据的計划定額，确定經济效果，制定組織技术措施計划，进行計划任务的經济計算。許多企业早就不再对生产經济活动进行有系統的分析了，但是要知道，这种分析在客觀上能够帮助挖掘表面上看不见的潜力。而生产計划和生产领导，如果没有經济分析，不但不能挖掘潜力，反而会隱蔽潜力。

加强經济核算，提高企业的独立自主精神，加强物質責任和物質关心等問題是迫待解決的問題。这些問題的解决，是发挥生产潜力的重要条件之一。例如，正如报刊上一再指出的，按照完成和超額完成計划而发給奖金，会使企业压低計划，因



为这样计划就容易超额完成。如果能够按照实际取得的成績，譬如說按照产量的提高（同以前所达到的水平比較），或按照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某些工业部門），以及按照一定时期所达到的计划赢利指标和成本指标的水平来支付奖金（当然要在完成计划的条件下），那么，就可使企业更深刻地研究生产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以便挖掘潜力和最大限度地利用潜力。但是，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工资委员会只是在不久以前才通过了一项決議，試行规定高尔基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屬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纖維造纸工业的企业工作人员，因增加生产总额、完成生产计划、超计划降低产品成本而給予奖励的制度。但是要知道，許多企业已經多多少少地有了这种經驗，而且这种經驗已被証明是正确的。现在可以普遍推广这种經驗。

在解决动员生产潜力的問題时，許多事情取决于我国的經濟科学。在七年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中指出，現在“经济学的意义日益增长。经济学必須同国民经济计划化和共产主义建設的整个实践密切联系起来”。七年计划提出一系列具有巨大国民经济意义的經濟任务。特别是建立工业生产经济和生产品織方面（或工业经济研究方面）的专门科学研究所的必要性，是很明显的。这个問題實質上沒有不同的意見，但实际上現在还没有得到解决。很早就有了运输经济研究所、建筑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但是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門——工业，却没有这样的研究所。这在頗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們实际上誰

也不去研究生产潜力、生产潜力的分析方法、计划和核算、供应和銷售、管理劳动的組織和机械化，等等。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許多研究经济和部門经济的科学研究所很少注意工业生产经济和生产品織方面的工作。

在发挥群众挖掘生产潜力的創造性方面，党組織起着重大的作用。对企业行政工作的經常监督，目的应该在于組織挖掘潜力的工作。对这一工作进行具体领导，在展开群众創造性活动方面对工会組織和共青团組織加以帮助，对一切革新創举給以坚决的积极的支持，同因循习惯和保守思想作斗争，所有这些都是党組織应该注意的中心。同时，做到实事求是和有计划，不容許轟一陣、嚷一陣，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样往往会使人对本来好的事情发生怀疑，妨碍挖掘生产潜力。

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者，懂得更充分地利用生产潜力、加强苏維埃国家的經濟威力和提高人民物質福利水平的重要性。在为超额完成七年计划进行斗争的同时，劳动者清楚地認識到苏联在同资本主义进行和平竞赛中的巨大作用。他們知道，他們为了提前完成七年计划所付的努力，会使我們在这个历史性的竞赛中贏得一定的時間，而这一点也正是在解决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設的宏伟任务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就的可靠保証。

（潘培新、韓灵鏡譯自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1959年第7期，5月18日出版）



共产党员是劳动人民的兒子

· 洪 禹 ·

几千年来，封建統治者在人民群众中間，造成了一种观念：“官为民之父母”。这种观念，反映了剝削阶级对待劳动人民的老爺态度，反映了劳动人民在他们統治下的被压迫地位。同这种观念相反，共产党人认为，一切共产党员，不論他們的資格多老，职位多高，无例外地都应当是劳动人民的勤务員，都应当成为劳动人民最忠实的兒子。

旧社会的“官”，絕大多数只忠于他們所屬的阶级（不論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官”都一样），或者只忠于他們自己（为了个人升官发财）。他們的主要任务，就是代表他們所屬的阶级去压迫和統治劳动人民。有时候为了麻痹劳动人民，以便于他們的統治，他們之中有些人，偶尔也曾經为劳动人民做了一点“好事”，他們就认为，这是对于劳动人民莫大的恩賜，因而要向劳动人民索取几十倍以至几百倍的补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銀”，这就是旧时代的所謂“清官”的真实写照。在他們看来，劳动人民用血汗供养他們，是天經地义。共产党员恰恰相反，即使他們当了党

和国家的干部，即使他們办了許多好事，为劳动人民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他們认为这是他們的义务，除了劳动人民所給他們的一份作为維持生活的工資以外，他們不向劳动人民要求任何补偿。在任何时候，他們只觉得自己給劳动人民做得还不够多、不够好。

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兒子；他們同时也是全体劳动人民的兒子。因为，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就是解放工人阶级自己和全体劳动人民；如果离开了本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力量，共产党和它的党员就不能实现他們的历史任务。共产党员是来自劳动人民，他們和劳动人民任何时候都是血肉相連的。共产党员忠于党的事业，也就是忠于劳动人民的事业；为党办事也就是为劳动人民办事。如果他們的工作做得不好，是党的損失，也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損失。所以，决不当把党的利益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决不当把向人民負責和向党負責对立起来。毛澤东同志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負



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是我們共產黨人做任何事情的出發點。任何共產黨員，只有當他在實際工作中表現了向人民負責的時候，才可以說，他在實際上表現了向黨負責。

舊社會的“官”，做事決不同勞動人民商量，當然更說不上向勞動人民學習。由於階級利益的对立，為了忠於他們所屬的階級，他們便不能不和勞動人民經常处于对立的地位。他們根本不想，也根本不能同勞動人民進行商量。同時，在他們看來，人民是“愚昧无知”的，而他們自己既然是“民之父母”，當然比人民“高明”，當然可以任所欲為，作威作福，稱王稱霸。共產黨員恰恰相反，他們對待勞動人民只能恭恭敬敬，有事同群眾商量，虛心地向群眾學習。共產黨和勞動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除了勞動人民的利益，它再沒有什麼特殊的利益，所以無事不可以同群眾商量。而且，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根據毛澤東同志經常對我們的教訓，歷史歸根到底是勞動人民創造的，只有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眾必須自己解放自己。共產黨員，作為勞動人民中的先進分子，為了組織廣大人民共同去爭取鬥爭的勝利，的確負有領導人民和教育人民的責任。但是，“教育者必須受教育”。共產黨員如果不善於向人民群眾學習，不懂得有事同群眾商量，他們就不可能實現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力量，不僅在於“它有馬克思列

寧主義的思想武器，有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有豐富的鬥爭經驗和工作經驗”，而且，還在於它“善於把全國人民的智慧集中起來，並且把這種智慧表現為統一的意志和有紀律的行動”^①。

經驗證明，只要我們善於向群眾學習，隨時了解他們的困難和希望，盡力幫助他們實現一切合理的、正當的要求，堅定地相信他們的確有無窮無盡的創造力，並且緊緊地依靠他們，那末，我們就一定會無窮的力量，足以克服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中可能遇到的任何困難。

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無數優秀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曾經作了英勇的奮鬥和偉大的犧牲。他們的確能夠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難，善於接受人民的批評和監督，一刻也不脫離人民，在任何場合，都表現了他們對於勞動人民的無限忠心。他們的確當得起“勞動人民最忠實的兒子”這個光榮的稱號。但是，任何共產黨員，決不應當自滿。毛澤東同志說：“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並且，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要求，用最大的努力，孜孜不倦地去爭取永遠做一個勞動人民的最忠實的兒子。

^① 見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



依靠群众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記中共安徽省桐城县石南人民公社双溪大队党支部依靠群众领导生产的經驗

冒菲君
秦聿震
陈立言

石南人民公社双溪大队共有二百三十六户、一千一百零六人，却只有一千二百九十八亩水田和二百一十二亩旱田。不但土地数量不多，而且质量也不好。在全队一千五百一十亩耕地中，除三分之一是较好的夹沙地外，其余都是中下等土地。全队二百三十六户中，在解放前要过饭的竟达百户以上。这个过去经常闹饥荒的地方，现在已经开始成了丰衣足食的幸福之乡。去年他们卖给国家六十九万六千六百斤余粮，今年三月间又卖给国家五万斤。此外，在今年一月间，他们还支援了兄弟队三万三千余斤种粮。在卖出了这些粮食以后，今年三月他们平均每人还有二百多斤口粮。社员们说：“双溪两条河，过去灾害多；自从来了共产党，幸福的日子多！”

为什么双溪大队的人民生活起了这样大的变化呢？一句话，那就是因为双溪大队的全体社员，在党支部的出色领导下，以惊人的努力，迅速地改变了这里的自然面貌，大大地发展了生产。特别是在合作化和公社化以后，他们的生产简直是日新月异，扶摇直上。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的四年间，他们的粮食产量增加了将近三倍。从他们现在的生产情况看来，今年生产还将大大超过去年。社员们说，今年庄稼比去年好多了。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全面地叙述几年来双溪大队的生产是怎样一跃再跃的，而只想简略地说说，党支部依靠群众领导生产的一些主要情况和经验。雇工出身的支部书记张玉林同志，并不喜欢向人夸耀他们的支部工作，但是社员们在谈到大队的生产发展情况时，总是把党支部摆到头里，他们说：“这是支部的功劳，没有支部的领导，别说一跃再跃，就连一跃也跃不了！”是的，这话并不夸大，在组织双溪大队农业生产的跃进中，党支部确实是起了堡垒的作用。

双溪大队党支部是怎样组织和领导生产的呢？支部书记张玉林说：“千能，万能，群众最能，离开群众寸步难行！依靠群众，就是我们工作的生命！”事实正是如此。双溪大队党支部几年来领导生产的每一活动，无不贯穿着依靠群众的精神。

双溪大队党支部在领导生产中，凡是遇到比较重要的问题，都



要一再和群众商量；甚至已经作了决定的事情，也耐心地倾听群众意见，并且根据群众的正确意见，修改自己的决定。例如去年十一月份，支部决定日夜突击积肥。过了几天以后，许多群众提出意见说，夜战不行，既劳累人，又功效低，支部应当把积肥任务分给大家，让大家自己想办法完成，不要死板地规定日夜突击。支部经过研究，接受了群众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决定。结果群众非常高兴，干劲冲天，超额完成了积肥计划。他们这种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为他们正确地组织领导生产，带来了说不尽的好处。去年双溪大队的大丰收，就和他们这种作风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去年头半年的生产中，他们连破三大难关的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去年一开春，他们就发生了肥料运不了的困难。因为肥料积得很多，运送工具却很少；再加上其他工作很多，人手不够，运肥就成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有人说，来个车子化就解决了。可是队上的木匠太少，就是全体动员，也是远水不解近渴。支部和大队的干部，想来想去找不出解决的办法，最后便决定发动社员讨论，让大家想办法。讨论会上，木匠童启云很快地提出了“全队大小木桶一齐动员，安上临时木轮，代替车子化”的办法。结果运肥的工作不但没有耽误，还提前完成了。刚刚过了运肥关，一下又碰上了秧苗关，一场突然到来的寒流，使六十亩早稻秧苗发生了棉腐

病。这是关系着头半年生产的严重问题。可是全支部十九个党员和大队的所有干部，谁也想不出挽救的办法。难道看着头半年生产完全垮台吗？他们和群众商量，终于从三十年前曾在江南帮过工的老农汪孔才那里，找到了用熟石膏水治棉腐病的办法。结果六十亩秧苗很快地又健壮起来了。真是“过了一关又一关”，秧苗插上以后，又碰到了九十天不下滴雨的大旱。起先还能用河里的水浇，后来河水也断流了。就在这时候，有人提出了河水太少、舍高救低的主张。许多人拥护这一主张，说不要两头都抓，到头来什么也没有抓到。这意见说得有根有据，很是动听，可是支部认为，这样损失太大，应该想办法把全部禾苗都浇上。经过全体社员讨论后，办法出来了：“全队动员找水源，挖河水，不到山穷水尽，决不放弃一亩地。”就这样，九十天的大旱，没有旱死他们一根禾苗。这三关的突破，不仅直接保证了夏季的大丰收，并且也为秋季的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社员们说，夏季能丰收，秋季就更能丰收，难道还有比九十天大旱更大的难关吗！

双溪大队党支部在依靠群众中，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经验呢？概括起来有如下四点：一是坚决信任群众；二是关心群众生活；三是和群众同甘共苦；四是办事实实在在。

坚决信任群众，是双溪大队党支部在依靠群众中的头条重要经验。坚决相信群众，就是要时时刻刻相信群众中的大多



数，相信他们有无穷的智慧，相信他们能够辨别是非，坚持真理，相信他们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前面所举的许多事实就是证明。当然，群众也会有缺点，他们的意见也有不对的时候；但是只要支部认真地分析群众意见，进行切实的说服工作，通过群众的讨论和自我教育，大多数群众是会纠正缺点，修改自己的意见的。双溪大队的许多事实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去年春天，支部根据一九五七年别的大队的成功的经验，决定推广早稻三六寸密植时，起初只有一小部分青年人同意，而多数的人反对，说是三六寸密植，连稻草也收不回。有些干部认为这个决定很难得到群众的同意，但是支部却坚决相信，只要这种方法是正确的，群众就一定会赞成。事实正是如此，当着他们经过摆事实，讲道理，使群众弄明白了三六寸密植可以增产以后，群众便立即同意了这种密植规格。

支部书记张玉林说：“你不关心群众生活，群众就不关心你，还谈什么依靠群众！”张玉林的话，正道出了他们依靠群众的另一条重要经验。双溪大队党支部把关心群众生活，列为自己的重要工作之一。去年在抗旱运动中，社员们在工地上劳动强度很高，非常疲劳，支部为了搞好社员生活，专门分配一个负责干部去管理食堂，保证社员能天天喝到开水和天天洗热水澡，夜里还吃到稀饭。支部书记张玉林到各抗旱工地上检查工作时，经常带着一些

简单药品，供社员必要时使用，夜里还给社员们盖被。有些社员没有蚊帐，张玉林等同志就把自己的蚊帐让给社员用。社员汪胜才中了暑，张玉林和副支书蒋恩胜亲自把他送到卫生所，并帮助汪胜才洗澡和找专人看护。社员们感动地说：“张支书真是象母亲对待儿女一样关心社员！”支部对社员各方面的生活都极其认真负责。有一次社员汪其太到大队部支领香油，当时因为没有油，张玉林叫他第二天再来领。第二天张玉林到乡里开会去了，忘记向别人交代这件事。第三天张玉林从乡里开会回来，一进门就想起这件事，说：“不好，有一件大事没有办！”有些人很惊讶，问他什么事。张玉林说：“汪其太要领的油还没有打！”有人说：“这点小事，何必这样发急。”张玉林说：“群众生活的事怎能说是小事？”他立即打了油亲自送到汪其太家里。汪其太的母亲感动地说：“张支书真是太关心我们了。”

双溪大队党支部依靠群众的第三条经验，就是要和群众同甘共苦。双溪大队党支部的干部和党员们，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高人一等的特殊人物，而是经常和群众同生活，同劳动。按上级规定，大队干部每年要做一百二十个劳动日，可是他们实际参加生产的时间远远超过这个规定。支部书记张玉林的腿有毛病，行走不方便，队里只要求他做一百个劳动日，可是他去年却做了一百二十七个劳动日。副支书、大队长蒋恩德，去年共做了一百八十个劳



动日。支委、团支書蔣恩胜，去年做了三百八十四个劳动日。党支部的干部是如此，其他党员也是如此。党员赵厚生同志，在去年带头車水抗旱的事情是十分动人的。他身体虽然不好，在去年抗旱运动中，他还是领着三十多人坚持抗旱。甚至在别人休息的时候，他还去挖河泥，淘水。有一天，赵厚生实在支持不住了，在水車上一陣头晕，跌了下来，一直滚到河底。当他被人救起苏醒过来的时候，又立即去車水，直到社員們硬从水車上把他拉下的时候，他才休息。赵厚生的模范行动使社員們受到极大感动，他們发誓，人在稻在，一定要抗旱到底。在党员的影响下，群众的干劲很足。例如，社員黃学胜在去年育秧时，为了看护秧苗，在秧田边搭了一个草棚，睡在田边，整整三十多天沒有回家睡过觉。有一次晚上干部去检查工作，看到他身子在棚里面，头却露在棚子外面，这个干部很奇怪，問他为什么把头露在棚子外面，他說：“天要下雨了。头露在外面，雨点打到脸上人就醒了，就可以馬上給秧田上水保温；如果在棚里睡熟了，外边下雨我不知道，不是誤事了嗎？”他說：“育秧是一年的大事，大家要我負担这样大的責任，如果秧苗搞坏了，就对不起社員，对不起党。”

为了实实在在地领导生产，双溪大队党支部很強調試驗。支部書記、支委和許多党员，不仅种了高产試驗田，而且还种了技术試驗田，他們亲自在試驗田里劳动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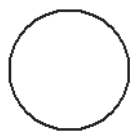
产，以便取得經驗。当生产中发现了一时不能解决的問題的时候，他們不是主观主义地輕率作出决定，而是首先組織試驗，然后根据試驗的結果作出决定。因此支部作出的决定一般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得到社員們的拥护和欢迎的。例如，去年开始实行密植时，按照乡里布置的任务，平均每人每天要插二亩多。很多社員說，要实行密植，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插不了二亩多。支部也認為二亩高了，但是究竟能插多少，心里也沒有底。少数人有急躁情緒，認為群众保守，應該好好批評一下。支部書記張玉林說：“大家还没有經驗，我們自己又沒有底，怎么能批評群众？”于是，支部决定組織几个組进行試驗。支書張玉林、副支書蔣恩德也分別带两个組試驗。試驗的結果，張玉林一个組五个人一上午插了二亩六分，平均每人每天插一亩多一点，蔣恩德一个組四个人一天插三亩八分，平均每人每天插九分多。根据这个情况，支部提出插秧的定額是每人每天插一亩。社員們馬上同意了這個定額，說这定額“在譜”。

双溪大队支部的领导工作虽然做得很好，但是他們也并不是沒有缺点的。例如，在领导生产上，他們对多种生产和副业还注意的不够，在党內外的思想工作，对有的队也还做得不够。現在他們正在努力克服这些缺点，爭取把工作做得更好。支部書記張玉林同志說：“我們有决心改正缺点，更好地依靠群众，發揮支部的堡垒作用，把我們的生产再向前推进一步。”



速度快 質量高

——武汉钢铁联合企业在建設中



·曹葆銘·

还在去年五月，一些資本主义国家的記者到武鋼工地采訪，工地的干部向他們介紹：原計劃一九五九年“七一”建設的一号高爐，要提前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投入生产；一号焦爐也要提前在一九五八年“九一”投入生产。他們不相信。可是事实上，这两座爐子都已經分別提前在去年八、九月里投入生产了！工人们幽默地說：咱們把他們心上的“？”号拉直了，使它变成了“！”号。

在今年，那些怀疑我們的跃进速度的人，如果来到全面施工的武鋼工地，那就只有目瞪口呆了！

每次，炼鋼工地的同志总是謙遜地向人講：目前施工力量都集中到炼鉄系統去了，他們的工程沒啥进展。但事实上，不久前还在鋪沙石垫层的巨大的主厂房基坑，轉瞬間就扎起了密密层层の鋼筋网，浇起了城坑似的混凝土基础。紧跟着，又回填了

十八万土方，并在百多个磐石般的柱子基础和立着几排拱門的平爐基础上，开始了安装工程。

在集中力量加紧建設的炼鉄工地上，速度快得就更令人难以想象。头天中午，二号高爐的基坑才扎好鋼筋，支好模板和平台，第二天早晨就填滿了一千八百多立方公尺混凝土，筑成了一个密实的巨型基础。安装工人刚举行誓师大会，没过五天，就从平地竖起了三座各有九公尺直径、四十多公尺高的热风爐。比一号高爐容积还大五十立方公尺的二号高爐爐体，只用十二天零二十五分鐘，便安装起来了。筑爐工人也在二十七天内，砌完了二千七百多吨高爐本体的耐火砖，比一号高爐工期縮短三十五天。这些工程都經過檢驗，質量优等！現在，这座二月十八日动工的大高爐已完成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工程量，要爭取在最近投入生产。

与这同时，武鋼还在加紧建設选矿厂、燒結厂、三号焦爐和許多矿山工程，并将



开始建设轧钢系统。他们今年将生产成百万吨铁，并且开始出钢。钢铁联合企业的规模正在逐渐形成。

二

不了解武钢的规模和作用，是很难理解又快又好地建设武钢对国家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的。

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党已经提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除鞍钢外，还要筹建第二个大钢铁联合企业。当然这是吃力的，但是为了要改变我国钢铁工业的落后状态，却是完全必要的。武汉处在我国的中心区（距海岸线七百公里），有长江水运之便，产品可以就近供应中南、西南、华东广大地区；武钢建成后，可以把武汉变成一个新的工业地带，在地域分布上将使我国有东北、武汉一南一北两个工业基地。这样，鞍钢、武钢和后来筹建的包钢，就组成了我国钢铁工业的三根梁柱。

伟大的盟邦苏联，用世界第一流的新技术和新装备来帮助我国建设武钢。被称为“西欧最大的高炉”的英国威尔斯钢铁公司四号高炉，只不过日产一千五百吨生铁，而武钢建设的每一座高炉都是日产两千吨以上。被称为“平炉之王”的每炉产钢五百吨以上的大平炉，目前全世界只有很少几座，而武钢将在今后若干年内陆续建起八座这样的大平炉。它的轧钢机将具有这样大的威力，能把每个七至十五吨重的

钢锭轧成各种断面的钢坯，然后再轧成各种各样的钢板、钢管和钢材，供给国家制造船舶、锅炉、拖拉机、车厢和架桥梁、盖工厂。

在炼铁工地，原来挂有一幅巨大的图画，它用形象表明：如果提前一天建成一座优质的高炉，将所增产的铁制成钢材，就能用来制造十万部双轮双铧犁，或七百辆翻斗汽车，或建立一座大型热电厂。早在武钢筹建期间，中央就指示要求提早完成该厂的建设。武钢正式动工不久，冶金工业部也发出了关于确保武钢工程质量的指示，着重指出：“通过整风运动大张旗鼓地向群众进行保证质量的教育，贯彻‘多、快、好、省’相结合的方针是必要的，而且要把它变为每一个工程施工过程中的群众性的工作。”

三

经过周密的准备，武钢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正式动工。在建筑基地上集中了两千多台施工机械，修建了金属结构厂、混凝土搅拌厂等二十一个工厂和车间。工地的运输、构件安装基本上实行了机械化施工。在已经做好的两千多万土方工程中，有一千五百多万方是由巨大的铲运机、挖土机群完成的。

从平地建起这样一个巨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在我国还是第一次，谁也没有经验。武钢党委反复进行贯彻“多、快、好、省”方针的思想教育，在绝大多数职工心上留



下了这么几个深刻的印象：一个是“武鋼工程要建好，国家命根要扎深”，“必須把优等質量的武鋼交給国家”；一个是“提前建成武鋼，快馬加鞭赶英国”。大家都想尽各种办法使工程做到質量好、速度快、成本低。

在高爐建設的第一仗中，他們就遇到这样一个問題：高爐基础要承担一万四千多吨重量，質量要求特別严格。必須在二十五公尺直径的八角形基坑里，埋設一百二十吨鋼筋和地脚螺絲，并且一气澆灌上一千七百九十立方公尺混凝土，不許間歇。世界各国都选在初春深秋对混凝土适宜的季节里，全部机械化施工，連續澆灌五十多小时。而他們偏偏遇上在酷热的夏季澆灌这个基础，还是用皮带机加手推車，半机械半人工施工。据計算，这样热天必須在三十小时內澆灌完毕，才能保證工程質量。他們进行了四个月的准备，組織了两次大演习。临澆灌时，还发生了意外的皮带机被堵死的現象，急得当場的干部、工人都慌忙跪到皮带机前，用手扣混凝土。紧急間，民工們忘了将受料槽漏口的“插杠”插上，一車混凝土就要往里倒，眼看便会将皮带机砸坏，使工作停頓。机械工向世远猛一下跳进受料槽，用自己的身体当“插杠”堵住漏口，保护皮带机，他被混凝土压得滿脸通紅，直冒汗。終于，皮带机被保护住了，施工沒有受到影响。为了使地脚螺絲附近的混凝土能搗得实，并且不撞歪地脚螺絲，近五十岁的老工人姜其斗

就赤身臥在混凝土上，用小震动棒一点一点搗固。結果，他們二十七小时就澆灌完毕，并达到了优等質量。

为了保證高爐爐体的焊接質量和速度，六級电焊工房煥波在酷暑中練習“高压电焊”。他故意把一块鋼板安在四根矮棍上，从哪边伸手也够不着焊口，再将身子探进鋼板底下，躺着焊，鬧得渾身被汗水湿透，两手被火花燙得斑斑点点。队长見他这个模样，忍不住笑道：“好干的不干，偏弄成不好干的来干。”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說：“能把这不好焊的地方焊好，好焊的地方就更能保證質量，加快速度。”大家都这样認真地勤学苦练，使高爐爐体的焊縫經過透視檢驗，全部达到优等。

工人們还自动提出：“苦干猛干加巧干，白天黑夜輪班战。質量安全全保証，施工效率成倍翻。”他們从技术革新着手，做到又快又好。过去安装一台大型設備，都是采用“分件安装法”，即在基础上一件一件地拼装构件。在安装翻車机中，青年工长郭成志却建議用“組合安装”的办法，将构件在外面拼装成整体，再往基础上吊，这样可以使安装一台翻車机的工期由九十天縮短为四十五天。起初，这个建議被接受后，又被否定了；有些主管人員認為，“鞍鋼都沒用过这方法，我們怎么敢用”。但全国大跃进的浪潮解放了人們的思想。老工人郭黄金和徐茂珠又帮助郭成志找到了适当的吊装方法，这个建議才第二次被采纳，使这台翻車机在四十五天里安装



完毕，质量完全合乎设计要求。接着，安装透平鼓风机的工人也经过一场辩论，用“先安辅助设备，后安本体”的方法，代替鞍钢胡兆森先进工段所用的“先安本体，后安辅助设备”的方法，安装效率比鞍钢提高两倍，使鼓风机提前开了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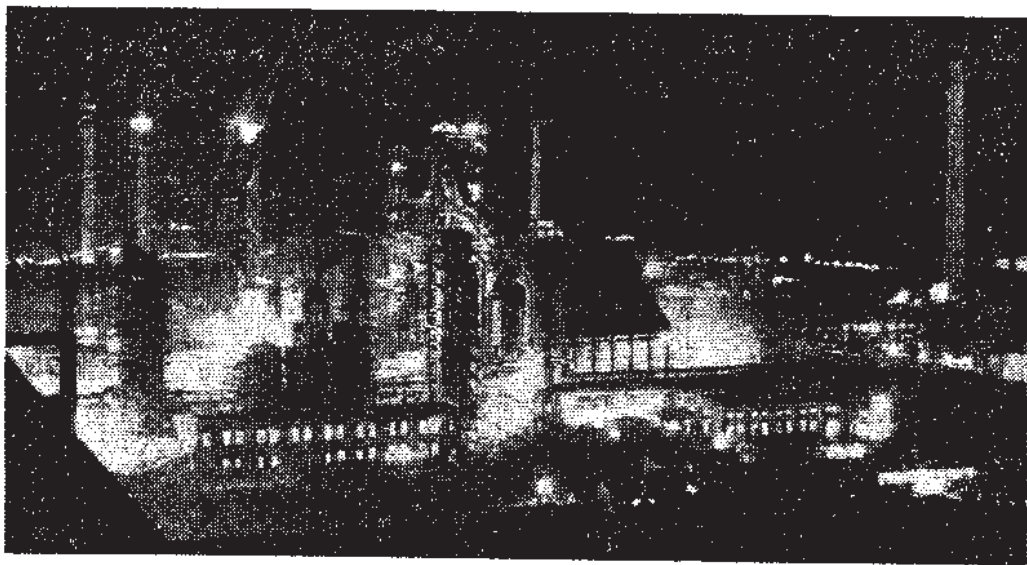
职工们苦战巧战的結果，武钢的一座高炉和两座焦炉都提前建成了，至今已生产出四十多万吨生铁和八十多万吨焦炭。

四

在今年建设二号高炉的工程中，安装工人曾提出保证：“七天建成热风炉，多快好省数第一。”三座热风炉共有七十八圈钢板，而每安装一圈钢板，连吊装、找正、焊接在内，得十二至十六小时，七天怎么

能完成？他们首先运用了去年翻车机“组合安装”的经验，事先在地面将七十八圈钢板拼装为二十三圈，大大地减少了高空作业，既加快了安装速度，又保证了工程质量。电焊工房煥波建议的“四边点焊法”和工长张行烈建议的用千斤顶找正炉圈上部椭圆的方法，使电焊和找正的时间也大大缩短。

但是，安装工组长李登香却遇到一个困难：九公尺直径的炉圈一吊起来，钢板就凸出凹进有些变形，对准了中心线，可对不上接口。他们用大锤将凸出的部分锤进去，别的部分又凸了出来，闹得中心线也移动了，个把钟头都对不好。安装的第二天，就有一圈因为没对准中心线，又重新吊起，重新落位。在班后会上，地面的工人批评上面的工人找中心、对接口的动



武钢夜景

新华社记者 杨森 摄



作太慢，影响进度。上面的人却说：“中心线对不准，要快也快不了。”急得副组长陈全智直催李登香：“这样不行啊，得赶快解决！”这个今年二十七岁，但已在鞍山等地安装过七个大高炉的组长，就同陈全智、张晶泽两个技工一起留在工段办公室里琢磨了半天，找到了一个挺简单的办法：事先对着中心线，在下一圈炉壳上焊两个角铁，在上一圈炉壳上焊一个角铁；上圈炉壳一落位，上圈的角铁就象栓子一样插进下圈的两个角铁槽里，任凭你怎么敲打钢板，都固定得死死的，上下圈的中心线也就始终对准不动。他这个改进立即和厉焕波、张行烈的建议组成了“边吊装、边找正、边焊接”的三管齐下的新的安装方法，使炉壳安得快，安得好，眼看着节节向空中伸长。他们四天零十九小时就将四十多公尺高的三座热风炉安成，其中心偏差还由设计允许的三十公厘降为九公厘，质量优等。接着，他们又以十二天零二十五分钟，安起了更难安装的高炉本体，中心偏差由允许的三十公厘降为五公厘。他们还节约了塔式吊机费用三万六千多元。热风炉顶上写着一首描写他们快速优质施工的诗：“东风荡漾红旗飘，安装健儿逞英豪。猛干巧干十七天，四炉并立冲云霄。”

炼铁工程指挥长方如玉同志每次都反复强调：今年能做到快速施工，同时保证优等质量，是吸收了去年大跃进的經驗。在建设一号高炉时，他们按照过去的施工程

序，先筑高炉基础，再筑热风炉和其他工程，将机械、电器安装工程都挤到最后去突击。今年，他们从去年的經驗中找到一个新的办法：先筑热风炉和主卷扬机室、料仓栈桥等安装工程量大的工程，让金属结构安装、机械安装和电器安装的工人们都提前进场工作。这样，在高炉本体快建设成功的时候，许多复杂的安装工程，如具有自动连锁装置的电器操纵盘、称量车等，都提前安装完毕，既缩短了总的工期，又避免了临时突击，保证了工程质量。

最近，高炉工地展开了群众性的质量检查运动，对每一个已经完成和正在建设的工程，都仔细地严格地检查，逐项交工验收。他们的口号是：“百年大计保质量，二号要比一号强”，想尽各种办法保证二号高炉达到全部优等质量。

武钢，这个钢铁工业的一支梁柱，在全体武钢建设者的辛勤劳动下，正在逐步成长，豪迈地参加祖国夺取钢铁的行列。

一九五九年六月中旬

更 正

本刊第十期第三十五页右栏第十五行“逐步地用更多的劣质煤和洗煤用的泥煤来发电”，“洗煤用的泥煤”系“洗煤后的煤泥”之误。



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援助”

顧 以 信

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援助”，是第二次大战以后美国进行对外扩张的一个重要武器，也是美国推行殖民主义的一种新方式。

美国对外“援助”的方式，是在先后两次世界大战中形成起来的。美国在两次大战的初期，都没有直接参加战争，而是向交战国大量出口军用和民用物资；及至参战之后，对同盟国的出口就更增加了。当同盟国的财力消耗殆尽或是外汇枯竭的时候，美国就用财政“援助”的办法，使这些国家继续向美国购买军用和民用物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外的大规模的财政“援助”，主要是通过“租借法案”进行的。

战后以来，美国的所谓对外“援助”，主要是根据美国国会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四年所通过的“共同安全法”进行的，其中包括“直接军事援助”、“防御支持”、“技术援助”、“开发援助”、“总统临时基金”等等，每年支出约四十到五十亿美元，侵略战争时期曾达七十亿美元。没有包括在这些项目之内，但属于同类性质的，还有剩余农产

品的贷款或“赠予”，每年约十余亿美元。除此之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也应该列入美帝国主义对外“援助”之内。因为这两个机构，都是在美国控制之下，执行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由这两个机构经手的“援助”，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八年六月底共约六十亿美元。将这三项加起来，从一九四五年七月到一九五八年六月，美国对外“援助”拨款总额约为八百四十六亿余美元^①。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最近五年（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八年）的出口总值，等于到一九五七年底美国私人资本输出的二点二八倍^②。

直接为美国的

侵略和战争政策服务

美国的各项对外“援助”，虽然名目繁多，但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直接为美国

① 此数包括一九五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未动用款项六十二亿美元在内。

② 根据美国现代商业调查一九五八年九月份统计，美国私人投资总数到一九五七年底是三百七十亿美元。



垄断资本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服务。

根据所谓“共同安全”计划，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八年六月，美国向受“援”国提供了二百零五亿美元的直接军事“援助”^①。这就是供应各种武器、军火工厂的设备、训练军事干部、补助地面建筑和建设海陆空军基地等的费用。美国用这些钱，输出了四万辆坦克和各种战车、一千三百艘舰只、五万七千门大炮、一万架飞机和二百二十万支各种枪支。

接受这种“援助”的一共有四十多个国家，它们大多数被拖进美国所拼凑的军事集团。从一九四九年开始，美国先后策划组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美澳新公约、东南亚“防务”条约和巴格达条约等军事集团，并且同许多国家订立了双边军事条约。南斯拉夫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后不久，就在美国的怂恿下，同希腊和土耳其结成了军事同盟，间接地参加了北大西洋集团。

在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国家里，美国根据所签订的条约，都驻有享受外交特权的军事代表团。它们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计划，决定这些“盟国”的军事预算和编制，掌握和训练这些国家的军队。美国把这些国家的军事力量，看做是美国国防力量的一部分。今年一月，艾森豪威尔吹嘘说，美国以这些军事“援助”，搞起了“自由世界”的一支有四百九十万人的陆军，有二千五百艘舰只的海军和三万架飞机的空军。但是，必须指出，美国所供应给仆从国家的军事装备，多是在军备竞赛中须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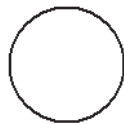
淘汰的装备。这种装备的供应时常不是根据对方需要，需要的有时供应很少，不需要的有时供应很多，零件的供应情况更特别混乱，这就必然对这种“援助”的实际军事效用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

除了直接军事“援助”外，“防御支持”是一种间接的军事“援助”。目前这种“援助”主要是给南朝鲜、南越和蒋介石集团以及土耳其等。这些美国的走卒由于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而经常有财政崩溃的危险。为了防止这种危险，美国特别向它们提供这种非军事性质的消费品和财政“援助”。它所提供的商品，很大部分是剩余农产品。“受援国”在市场上出卖这些商品以后，所得款项再用于军事开支。根据一九五八年度“共同安全”计划，这一项援助约为七亿美元，达直接军事“援助”的三分之一以上。

还有所谓技术“援助”。美国在向受“援”国提供所谓“技术知识”的借口下，派遣了大批“技术专家代表团”在受“援”国勘察资源和收集情报，为美国垄断资本的输出打下基础。

还有一种“开发援助”。过去是以赠予为主，一九五七年改为“开发贷款基金”，以贷予为主。这是用来拉拢那些尚未参加军事集团的国家的诱饵。美国还可以依靠这种基金，在这些国家里开发生产为美国所需要的战略原料。

^①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艾森豪威尔致美国国会“共同安全计划”执行报告。



“共同安全”计划中，还有所谓“总统临时基金”。这是为了便利美国总统应付没有预料到的“需要”，是临时的、不受法律限制的一种对外“援助”。一九五七年支持约旦右派复纳布西内阁的军事“援助”，就属于这种性质。

束縛受“援”国的枷鎖

美国束縛受“援”国经济的一个枷鎖是所谓“对等基金”。按照美国法律，凡是美国赠予的非军用（包括“防御支持”）物资，由受“援”国在本国市場上出售，受“援”国須以等值的当地货币存入一项称为“对等基金”的特別賬戶，其中百分之十归美国政府使用，其余百分之九十由受“援”国使用，但是必須經美国批准^①。美国又限制“对等基金”的用途，规定只能供军事和国防经济重要設施之用。应该指出，在美国“对外援助”中，名义上是“贈予”，实际变为“对等基金”的这笔资金，是美国在受“援”国可以运用的相当大的一笔资金，美国可以借此来直接干預受“援”国的经济生活以至政治生活。因为“对等基金”的使用，必須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在许多方面是直接侵犯受“援”国的主权的。

还必须提到的是美国的剩余农产品的“援助”，这是根据两种法律规定进行的：一种是“共同安全法”规定的，指定“共同安全”拨款的一部分須用于輸出剩余农产品，

所得收入按“共同安全法”处理。从一九五三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五八年七月底，根据“共同安全法”輸出的剩余农产品，共值二十亿三千七百万美元。另一种是根据一九五四年“农产品貿易发展与援助法”进行的。到一九五八年三月底为止，根据这一法律傾銷的农产品达五十七亿七千四百万美元，其中三十八亿二千四百万美元貸予外国^②。剩余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場价格，而且必須用美国的輪船装运，运费也高于国际运价。这就使受“援”国遭受相当的損失。剩余农产品出售之后，美国往往又以所得当地货币貸給受“援”国，这就使一块美元发生两次剝削作用。截止一九五八年三月为止，根据“农产品貿易发展与援助法”获得貸款在一亿美元以上的国家有十个，其中以印度为最多，有三亿六千二百万美元，南斯拉夫次之，为二亿九千三百万美元，西班牙为二亿五千三百万美元^③。一九五七年二月，美国国会又通过对这一法律的“庫利修正案”，规定将出售剩余农产品所得外币的百分之二十五交由进出口銀行貸予美国在外国的私人企业。这样就增强了美国公司在受“援”国的地位。

“共同安全法”是直接为美国的侵略和

① 美国“一九五四年共同安全法”规定。

② “国际合作署工作报告（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为止）”第14頁。

③ 同上第70頁。



战争政策服务的，这一点，连美帝国主义者自己也并不隐讳。在这个“共同安全法”中，美国公然提出它的目的是对“友好国家给予军事、经济和技术援助，增强自由世界的共同安全和单独及集体防御，借以维持美国的安全和推行美国的外交政策”。还公然说，开发这些国家的资源，也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和“便利这些国家有效地参加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系”。在这个“共同安全法”中明目张胆地规定，取得军事“援助”的条件是：履行它们所“承担的军事义务”，“对发展及维持它自己和自由世界的防御力量提供它的人力、资源”，“采取发展它的防御能力所需要的一切合理措施”等等。

由此可见，美“援”是一种特殊方式的国家资本输出，比一般垄断资本的直接投资更富有侵略性。在反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幌子下，美国企图把受“援”国拴在自己的战车上，达到奴役这些国家的目的。

受“援”是名，受害是实

美国的对外“援助”是对受“援”国家野蛮的掠夺。接受美“援”的国家，常常是陷入泥潭，不能自拔。

为了取得美国的军事“援助”，受“援”国不得不支出巨额军费来进行军事化，它们必须花费几倍于美国“援助”的款项扩充军备。从一九五〇年度到一九五八年度，美国对它的“盟国”所给予的军事“援助”是

二百零五亿美元，而“盟国”所支出的军费则达一千三百亿美元^①。英国在一九五二年度中取得一亿六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但军费支出达三十八亿余美元。美国的军事“援助”只占英国军费的百分之四点二。法国在一九五二年度的军费为美国军事“援助”的七倍。这不仅使这些国家负担沉重，而且由于经济军事化的结果，民用生产和以出口为目的的生产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以致整个国民经济失调。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一年，西欧各国对外贸易差额平均每年达六十五亿美元，六年共达四百亿美元。结果是通货急剧膨胀，货币贬值，外汇储备大大减少，生活费用上涨。

美国的军事“援助”，对不发达国家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例如泰国，自一九五〇年十月至一九五七年六月，它从美国得到了军事“援助”二亿七千四百六十万美元，经济“援助”一亿三千七百三十万美元，共计四亿一千一百九十万美元。而泰国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年仅仅直接军费开支，就达七亿二千万美元，为美国全部“援助”总额的一点七五倍。到一九五九年三月，美国给予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共为二亿三千五百万美元，但巴基斯坦一九五八年度一年内的军费开支即达一亿七千万美元。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写道：“巴基斯坦即使能很快地生产出满足国

^①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艾森豪威尔致美国国会“共同安全计划”执行报告。



内所需的足够的粮食，但它仍将长时期地依赖美国的援助，原因在于它要給武装部队拨出大量军费。除了美国的直接援助以外，巴基斯坦每年的军费要占预算的百分之六十九到七十以上。”



但是受“援”国所遭到的灾难还不只这些。它们的工农业生产由于美货倾销而急剧减退。从一九四八年三月到一九五七年六月，以美“援”拨款输出的非军用的商品共計为一百七十一亿美元，其中原料及半制品值六十一亿余美元，粮食和肥料等五十亿美元，燃料二十三亿美元，机器及車輛共計只有二十八亿美元，



入 魔 网

就是六分之五以上是消费品。在这些倾销的消费品中，剩余农产品的“援助”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一九五五年占八分之一，一九五六年占五分之一，一九五七年占二分之一。

剩余农产品和其他消费品的倾销，使受“援”国受到几重剥削和奴役，使受“援”国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的摧残。向

来依靠农产品出口的国家输出也日见减少。现在南朝鲜每年粮食生产比美国占领前减少了三分之一。缅甸和泰国等出产大米的国家的主要市场也被美国夺去了。泰国从一九五〇年接受美国“援助”后，大米输出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木材输出减少了百分之三十，烟草输出减少百分之五十。这些国家的工业在美“援”物资倾销



的压迫下，也日益减产。泰国的纺织工厂关闭了四分之三。南朝鲜的工业生产水平现在还不及日本统治时期的一半，失业和半失业者达六百六十万。

美“援”又是美国对受“援”国进行政治讹诈的资本。美国利用美“援”支持一些受“援”国的反动集团上台，把它培养成美国的傀儡。伊朗事件是洛克菲勒所亲自参与的“得意杰作”。一九五二年摩萨台首相采取了不依赖美国的立场时，美国就停止给予“援助”，并策动恢复摩萨台政府；在摩萨台政府被推翻后，美国以美“援”支持亲美的萨希迪政府；不但取得了石油利益，而且还迫使伊朗参加了巴格达条约集团。一九五三年美国利用巴基斯坦粮荒，拒绝给予当时的纳齐穆丁政府以援助，并且秘密策动阿里上台。事变成功后，美国立即给予阿里政府小麦一百万吨并增加其他“援助”。一九五四年巴基斯坦便参加了军事集团。

总而言之，美国的所谓对外“援助”，对于受“援”国说来只是受“援”其名，受害其实；而对美国说来则是一桩一本万利的买卖。正如美国“幸福”杂志所炫耀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经参与了好几国政府的建立和倒台。今天美国的驻外大使‘经管’的国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通过美国新闻处，美国人不仅为了‘交朋友’，而且是为了把千百万人的思想改造成美国型的。正式地或非正式地分布在全世界的美国人，正在为建立反共联盟和消灭亲共组织而努力。他们训练并

间接地指挥外国部队。他们管理和支持了其他国家的国民经济。”（一九五七年二月号）这段话概括地表明了美国垄断资本家的野心和目的。

英国象一个牡蛎，被剖开吞食

美国的对外“援助”的目的，既然是霸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它打击的对象，不能不首先落到它的西欧的伙伴们，特别是英国的头上。

英国著名的保守党人埃莫里早在一九四六年就预感到：“不列颠帝国好象是一个牡蛎，美国要用贷款来剖开它。不列颠帝国的每个部分，……就将一块一块地为美国依次吞食掉，就将成为美国工业的剥削对象，成为美国财政体系的附属品，最后必将成为美国的附属国。”

英国成为美国占领下的军事基地已有十年。一九四八年，美国利用“马歇尔计划”，并借口当年六月的柏林紧张局势，迫使英国工党政府同美国签订了秘密协定，美国开始派遣B—29型原子轰炸机队和空军人员驻扎英国。从此，一向征服别国的英帝国主义被美国征服了。一九五六年末，美国在英国有三十四处基地，美军人员五万名。驻在英国的美国轰炸机队，经常携带原子弹巡逻飞行，严重威胁着英国的安全。这些轰炸机基地的建筑和维持费用，美国还强迫英国负担百分之四十。一九五七年三月百慕大会议的决定和其后国防大臣桑迪



斯制定的以“核子威懾”为主的五年軍事改組計劃，进一步肯定了英国本土要充当美国海外的原子和火箭基地。一九五八年二月，英国又同美国签订了导弹基地協議，在东英格兰建立五处美国导弹基地，基地建筑費用由英国負担。这样，英国就从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艦”变为“易被毁灭的导弹基地”了。

美国垄断资本家已成了英国工业资本家的太上皇。英国财政部的各种經濟计划和政策，华盛顿都要过問。美国在一九四九年公开强迫英国实行英镑贬值，为美国金融势力扩充地盘扫清道路。英国所欠美国债务，約占英国外債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到一九五七年年底，英国欠美国的債款总计四十六亿五千万美元（合十六亿六千一百万英镑），这还不包括利息在內。光是一九五七年英国侵略埃及战争失败后，就向美国借了十一亿美元。这些债务估計在相当长的年代里是还不清的。

列宁說：“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它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德国对比利时的野心，法国对洛林的野心），因为第一、地球已經瓜分完了，在重新分割的时候，对任何一块土地都是想伸手要的；第二、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爭夺霸权，即爭夺領土，目的不完全是直接为了自己，主要还是为了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对德国來說，比利时是一个特别

重要的反英据点；对英国來說，巴格达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反德据点等等）。”^①

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再分割的斗争中，美帝国主义当然要搶夺殖民地和經濟不发达地区，但是它不能以此为滿足。从世界再分割的战略部署来看，美帝国主义显然还需要控制已被战败的德、意、日帝国主义，而且需要繼續削弱在大战中已被削弱的英、法、荷等帝国主义，夺取它們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据点，摧毁它們的霸权，以至将这些国家也放在它的控制之下。控制了这些工业高度发展的帝国主义国家，就更可以为美国深入到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創造有利的条件。这样才能实现它独霸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目的。

老牌殖民帝国，首先是英、法两国，企图阻挡美国对它們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进攻，斗争是劇烈的，但是美国还是在許多地方得了势。例如，英国想用自己的“援助”計劃——“科倫坡計劃”——来对抗美国对南亚和东南亚的扩张，但没有成功。自从美国参加了“科倫坡計劃”以后，这个計劃实际上已变成美国渗入东方的补充工具之一。法国在战后年代对其殖民地的投資，大部分是依靠美“援”。在印度支那战争时期，法国广泛地运用了美国的軍事和技术“援助”。現在，美国向南越政府提供“援助”的目的是，将法国从那里排挤出去，巩固美国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第261頁。



位。目前，法国正广泛利用着美国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在阿尔及利亚进行肮脏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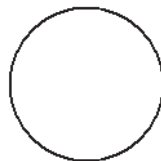
为资本输出开辟道路

帝国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资本输出。美“援”除了本身是一种特殊性质的资本输出之外，它还为美国企业大量的资本输出开辟道路。美国已经成了最大的帝国主义。在战前，英国的国外投资是二百三十亿美元，美国是一百一十五亿美元，英国为美国的二倍。一九五七年，美国为三百七十亿美元，英国仅剩下一百八十亿美元，美国为英国的二倍多。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发展。就是在英联邦之内，一九五〇年英国的投资还比美国大百分之二十，现在已经扯平为一比一。美国在英国本土的私人直接投资，到一九五七年底达十八亿九千万美元，控制了英国的汽车、机器制造、石油、化学、油脂及日用品的若干重要工业部门。现在英国已成为美国海外私人投资的第三位国家。

美国通过资本输出，进行殖民主义剥削的典型例子，是在拉丁美洲各国。美国的投资占拉丁美洲全部外国投资的百分之八十。美国海外公司全部投资的百分之三十五是在拉丁美洲。美国垄断资本控制住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命脉，垄断了它们出口贸易的一半，迫使各国成为单一的原料供应地，使它们不得不依附美国，忍受最大限度的剥削。近两年来，美

国又把拉丁美洲当作转嫁经济危机的对象。美国一面对拉丁美洲扩大资本和商品输出，一面又提高自己的关税壁垒，削减原料进口，更进一步压低原料价格，使拉丁美洲各国对美贸易逆差激增，工农业生产萎缩，企业大量倒闭，财政经济情况严重恶化。一九五八年，阿根廷、巴西等七国所欠外债，达五十七亿美元以上。在一九五八年一年中，阿根廷人民生活费用上涨了百分之四十五，巴西上涨了百分之三十。

美国垄断资本今后将继续鼓励对外的私人投资。美国打算在十年内，把对外私人投资从一九五七年的三百七十亿美元增加到七百亿，发展的重点是亚非地区。作为美国对外扩张工具的对外“援助”的重点，当然也是放在亚非地区。



“援”外重点的转移

美国的对外“援助”，密切联系着美国侵略政策的部署，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重点。在美国发动侵略战争时期，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后，美“援”的重点，就开始从西欧转向亚非地区。以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〇年相比，“美援”按地区分配的比重有了很大的变化：远东和太平洋地区从百分之五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六，中东从百分之十六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七，西欧则从百分之七十九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七。

近年来，美国对西欧国家的“援助”日



渐减少。一九五五年以后，西欧已停止接受“防御支持”，直接军事“援助”也大大减少了。目前美国对北大西洋集团国家主要是提供现代化武器，把它们当作美国军火垄断资本的主要市场。

对于参加军事集团的亚非国家，美国认为它们已经是“上钩之鱼”，因而只给予军事拨款。至于什么经济和技术援助之类，就采取很吝啬的态度。这在洛克菲勒一九五六年一月给艾森豪威尔的秘密信里，交代得很清楚，他说：“在这一类国家中，（美国）政府的补助和贷款主要可以采取军事拨款形式，因为已经上钩的鱼用不着诱饵。”如果还要给予一些“经济援助”的话，那“只能是为了使有关的合适政府继续执政并遏止任何政府的反对派而必要的那么多”。为什么呢？因为“例如对土耳其的拨款（经济援助）可能在某种情况下造成同原来的意图恰恰相反的结果，那就是可能加强它的独立和削弱它的现有的军事同盟的倾向”。因此，土耳其想以美国贷款发展本国官僚资本工业的要求，遭到了美国的拒绝。巴基斯坦想建立黄麻厂和钢铁厂，也遭到了美国“顾问”的拒绝。

美国企图以美“援”拉拢一些中立国家。美国在一九五七年七月提出了所谓“援外”的“新面貌”，其主要内容是将“军事援助”与“经济援助”分开，把“军事援助”列入美国国防部预算，由国防部管理，以便与美国战略、军备计划更紧密地配合。这样分开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为了便于对中立国家进行欺骗。关于这一点，在洛克菲勒写给艾森豪威尔的秘密信里说得很清楚。他

说：“在这一类国家中（那些奉行或倾向于奉行中立政策的国家），经济援助的重点应该是创造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建立的经济关系最后会使这些国家自然而然地加入我们发起的军事条约和同盟。这种政策的实质应该是：我们同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的发展，最后会使我们能够在当地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中立国家，我们应该支持任何想取得我们的帮助着手进行超过真正切实可行的大规模经济计划的倾向。（例如埃及那样——如果纳赛尔政府接受这个援助，那就会造成这种情况，埃及必定陷入过分庞大的工程上，从而长期需要我们的支持。）通过这种办法，我们可以希望使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转向比较合乎希望的方向。”“在鼓励对这些国家进行私人投资时，应该支持那些反对现政权的部分或者个人。这样，我们就能为使这些国家的政策转到比较健康的方向打好基础。”“这类国家中最重要的一个当然就是印度”。

目前美国正在向亚非地区的某些中立国家推行这种“经济援助”政策。一九五八年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将“共同安全”计划项下的“经济援助”和进出口银行贷款一并计算在内，共六亿四千万美元。美国不但“援助”印度政府，而且正如洛克菲勒所说的，也在“支持那些反对现政权的部分或者个人”。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希望使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转向比较合乎希望的方向”。但是，实现这样的希望是很难的，因为它必然遭到这些国家广大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的反。对。



“援助”到那里，那里就反美

美“援”的目的既然是为了霸占资本主义世界，它就必然走向美国侵略者願望的反面，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制造了日益强大的反美力量。美“援”本身是很好的反面教员。美“援”到了那里，那里的人民群众甚至政府人士，都会从自己吃到的苦头中，逐步認識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質。

在西欧，“馬歇尔計劃”执行的結果不是“欧洲复兴”，而是經濟軍事化，和平工业縮小，出口下降，政府預算赤字浩大，生活費用高涨。在英国，“要貿易不要援助”的呼声得到日益广泛的响应。

一九五四年以来，美国减少对欧洲的“援助”，固然是由于亚洲形势的改变迫使它不得不轉移它的注意，但是西欧国家不欢迎美“援”，抵制美“援”，也是一个原因。

中近东和非洲的人民，鉴于一些国家接受美“援”后被拉入軍事集团，受到美帝国主义的詭詐和控制，因而把美“援”看做是一种灾难。一九五三年在貝魯特召开的保卫中近东各国人民权利大会通过的決議說：“我們各国要拒絕利用帝国主义的資本……擯弃美国的任何援助，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对于专为推行“技术援助”的所謂“第四点計劃”，由于亚非地区的人民反对，使得美帝国主义者甚至連这个名称都不敢提了。一九五三年六月，美国技术合作总署的领导人安德路斯曾說：“‘第四点計劃’这个名称将尽可能停止使用。”他說明这一决定是因为“落后国家”的人民

对于“第四点計劃”的态度同他們对于早已厌烦了的美国可口可乐饮料的广告的态度一样。“艾森豪威尔主义”也沒有碰到更好的运气，美国派了特使，专门从事兜售，并未騙到更多的魚兒“上鉤”。在一九五七年底的亚非团结會議上，亚非国家一致表明了它們的反对态度，在會議的宣言中严正地譴責了“艾森豪威尔主义”。

自然，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政府中也有些人对美“援”还存在着幻想。但是，除了甘願依附美“援”以期苟延残喘的少数人外，許多人都对美“援”抱着怀疑的态度。許多国家因接受美“援”而受害的前車之鑒，不能不使他們寒心。他們所期望的是无条件的、建設重工业的援助，这根本不是美国的“援助”所能办得到的。

美国的軍事“援助”，已日益使它的政策，陷入了自身的矛盾。

美国的軍事“援助”的負担是很大的。在一九五九年度的“共同安全”計劃拨款三十二亿多美元中，“軍事援助”和“防禦支持”占了二十二亿多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拿去填了李承晚、蔣介石、吳庭艳等反动集团的无底洞。“华尔街日报”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日社論說：“美国似乎承担了一种任何国家都不該承担的义务。”但是看来，美国的这个担子还是不得不繼續挑下去。

美国的政策就是这样地陷入了自身的矛盾。因此，在美国国内，不仅广大人民反对美“援”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在統治階級中攻击美“援”政策的人也日益增加起来。“华尔街日报”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日和以后連續发表的文章批評外“援”說：“接



二、三的国家不但没有被争取到美国方面来，反而倾向于中立主义或是亲共。……它往往是树立了敌人而不是争取了朋友。”这家报纸主张大大减缩美“援”的规模，对美“援”进行严格的管理，加强对受“援”国家的监督等等。美国统治集团虽然在利用美“援”进行扩张这一点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集团之间利益极为矛盾，各集团所得利益不同，他们在做法、规模、重点、对象等问题上都存在着分歧。以洛克菲勒集团为代表的“国外利益派”主张实行“广泛而代价很大的援外计划”，他们对于向亚非不发达地区进行扩张具有巨大的野心。但是，中西部和南方财团的主要利益是在国内市场，他们担心美“援”会导致受“援”国的工业发展，从而影响他们的同类产品的销路，所以他们竭力主张大大减少外“援”，强调“节约”。今年国会中新增加一批“自由派”的议员，主张增加国内的公共工程开支，增加住房建设、失业救济等经费，这必然会影响“援”外拨款的数额。艾森豪威尔等人必须考虑各个财团的利益和美国本身力量的限制。美国国会每年讨论拨款计划时，各个集团的代表人物之间争吵极为剧烈。去年，艾森豪威尔结合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所有重要头目，采取各种方式向人民进行宣传，呼吁支持，并且组织了許多研究“援”外问题的委员会，进行专门的研究，写报告。即使如此，去年的“援”外拨款还是被国会削减了六亿多美元。这就说明，如果形势没有重大的变化，美国的“援”外拨款要想作更大的增加是很困难的。

当然，美国的对外“援助”今后还是要继续下去，但是它已日益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而更趋被动：

一、社会主义阵营的优势不断增长，美国想发动大战已日益困难，美国虽然还未放弃已破产的“实力地位”政策，但它不得不考虑如何应付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竞赛的挑战”。

二、美“援”的声名狼藉，欺骗面目日益暴露，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无私援助相对照，美“援”已大大丧失其吸引力。美国必须作更多的掩饰，使美“援”有更大的欺骗性和诱惑力。

三、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巨大（一九五八年为三十四亿美元），垄断集团内部对“援”外意见分歧，“军事援助”负担又不能有很大的减少，因而更带欺骗性的“经济援助”数额，不可能有很大的增加。

美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对外“援助”，在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一个强大的美国金融帝国。经过战后十四年，它并没有达到它原来所预期的目标。它企图控制一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已经处在四分五裂之中。它企图控制一切经济不发达地区，但是在这些地区的反美运动正在高涨，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在迅速消失。美国最忠实的走卒是蒋介石、李承晚、土耳其和其他寥若晨星的反动朝廷，他们的反动统治已经摇摇欲坠。美国继续对外“援助”，继续对外扩张，必然使它陷于更加孤立的困境。美国的金元所造就的反美力量，终将成为埋葬美国反动派的坟墓。



批判的繼承和新的探索

(一九五九年五月在一个座談会上的講話)

陈伯达

在去年科学规划會議上，我講过厚今薄古的問題，引起了一些討論。有的文章写得很好，比如郭沫若同志、范文瀾同志的文章就写得很好，比我講的要好。但是，也有人对厚今薄古这个提法作了錯誤的理解，在思想上有点混乱。例如，有人曾經認為提倡厚今薄古，就可以对历史遗产、文化遗产采取粗暴的态度，这就完全不符合我們原来的意思了。

要不要接受历史遗产、文化遗产的問題，对我們馬克思主义者說来，是在原則上早已解决了的。大家都知道，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就是：英国的政治經济学、德国的古典哲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列宁在“馬克思主义底三个来源与三个組成部分”那篇文章中，就講得很清楚。他說：“馬克思主义里絕沒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絕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偏狭頑固的学說。恰巧相反，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經提出的种种問題。他的学說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經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說直接繼續。”（“列宁全集”第19卷，第1頁）馬克思主义是伟大創造性的科学，但这个伟大創造性的科学是有所繼承的，并不是凭空而来的。

十月革命后，有一些人，以波格丹諾夫、卢那卡夫斯基为代表，他們主张抛弃文化遗产，企图建立一种所謂“純粹无产階級文化”。列宁在他起草的“論无产階級文化”文件中，严厉地批評了这种錯誤观点。在“青年团的任务”講話中，列宁也講过這個問題。他說：“无产階級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階級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这完全是胡說。无产階級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資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創造出来的全部知識发展的必然結果。”（“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4頁）可見，在无产階級当权以后，接受文化遗产，依然是无产階級的重要任务，那种否定人类过去一切有价值成就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很有害的。

在接受历史遗产这一个問題上，毛澤东同志对于我們中国共产党员，同样作过很明



确的指示。他在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学习问题的一段讲话中说过：“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历史遗产、文化遗产的态度，这里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而且，毛泽东同志在二十年前所提出的这个任务，对于目前的学术界来说，也还没有过时。

正如俗语所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既然要继承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要对历史遗产给以总结，为什么我们又提出“厚今薄古”的问题？而且在我国学术界中，关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工作，已经出现一些活泼的气象，在这样的时候提出厚今薄古的问题，是不是必要呢？

我想，厚今薄古问题的提出还是有道理的。道理何在呢？道理就是象上一次说过的，在我们的学术界和文化教育界中，有一种厚古薄今的偏向，而且在继承历史遗产的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所谓“厚今薄古”，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学术上、文化上的工作，必须有创造性的活动，敢于打破老传统的束缚。百多年来一些启蒙人物曾经先后提出过这样的思想。谭嗣同关于“冲决网罗”的口号，吴虞关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目的都是要求人们从老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追求新的知识。前人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在于：以前那一批人是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去看待这个问题，而我们看待这个问题，则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中国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性以及他们对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软弱性，使得过去那些启蒙人物不能彻底地、历史地解决古今的关系，还更缺乏在学术上的真正的独创。他们没有能力对于古代的思想和文化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批判。在他们那里，或者企图调和古今，托古改制，对过去的批判，限在皮毛方面，而且仅仅采取温和的态度，否认社会事物新陈代谢的斗争；或者有时站在这一个片面的极端，有时又站在那一个片面的极端，把古今都绝对化，认为古代的一切事物都绝对地坏，资产阶级的一切事物都绝对地好，而其中许多人在作了一阵叫喊之后，又回过去，只埋头在旧书堆里面去寻求知识。总之，他们的方法，是折衷主义或者绝对片面性。

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打破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性。按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列宁全集”第19卷，第2页）。无产阶级用这样的世界观去观察自然界发展的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国无产阶级在这个世界观的指导下，对于旧社会进行了



最彻底的批判，揭起了两次社会革命的大旗，鼓舞了全民的觉醒，结果造成了几千年来伟大变化的新局面，而在中国地面上基本上结束“人类社会的前史”。就学术界、文化界来说，远在全国解放之前，已经被这个世界观改变了面貌。无产阶级的解放，形成了全民精神的解放。在全国解放以后，这个世界观正在促使学术界、文化界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而将为我国的学术界、文化界，带来空前未有的繁荣和跃进。中国人民在两次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已经反映而且必然将继续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在学术界、文化界的战线上。新的伟大时代，需要一批又一批的灿烂的群星，需要许许多多新的多才多艺的人物，需要新的大学问。这种新的学问，不是孔子老子的学问，不是程子朱子的学问，不是顾炎武戴震的学问，不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学问，而必须是超越中国一切前人所达到过的各种成就的学问，必须是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指导下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问。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迅速改变旧中国经济贫穷和学术空白的面貌。这种学术的空白，难道仅仅依靠在废纸堆里面寻章摘句，就能够填补吗？难道仅仅依靠我们历史上那些旧知识，就能够填补吗？当然不是这样。旧的资料，旧的知识，不论是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对于我们发展新的学术和文化，有各种不同的用处。但是，我们决不能采取抱残守阙的态度来对待这些材料，而是要利用这些材料“推陈出新”，作为新的学问的养料。我看到有些人的文章引用了恩格斯以下一段话：“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一个特殊的分工部门，都具有由它那些先驱者传授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一定思想资料作为前提。”（给史密特的信，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495--496页）恩格斯的这段话当然是对的。不知道这一点，就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人在记起恩格斯上述这段话时，却又忽视恩格斯以下的另一段话：“每一时代的理论的思维（我们这一时代的理论的思维也是如此）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且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反杜林论”旧序，“自然辩证法”，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8页）恩格斯的这段话当然又是对的。不知道这一点，更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但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整理大量的旧材料，旧知识，加以科学的、历史的新概括；而且更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在各种学术领域，各种文化领域，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继续不断地去掌握和整理大量的新材料，经过周密的、系统的研究，提出新的问题，作出新的概括。

掌握古代的材料，古代的知识，这是一回事；从古代思想的圈子摆脱出来，从资产阶级世界观局限的范围摆脱出来，开拓学术文化的新领域，大踏步地把学术文化推向发展的新阶段，这又是一回事。对于后一件事来说，古代的材料，古代的知识，可以作为



启发，作为借鉴，并且，由于无产阶级世界眼光的照耀，在一定场合，象中国一句老话所说的，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但是，一般说来，我们主要地还是得依靠新时代给我们提供的日益众多的新材料，新经验，来扩大我们的眼界，探索和揭露前人不能发现的世界和社会的秘密。同时，这也决不是单凭本国已有的历史成果就能济事。我们必须研究世界一切已经达到的伟大成果的基础上，来从事我们学术文化的革命工作。象那种故步自封、坐井观天的“国粹主义”，在这里是不能立足的。

苏联科学文化的伟大的创造性成就，是我们的榜样。解放了的中国人，为了尽快地建设自己的新国家，对于新知识的追求，如饥如渴。从大家努力向苏联学习这一件事，也可以说明这点。

我们国家有很悠久的历史，这是幸事，但是，如果对待不当，又是不幸事。浩如烟海的历代文献，越来越多地被发现的古文物，这些有吸引人的一定魅力。当然，对于这些，我们现代和后代的人民需要付出一定的力量加以研究、整理和总结，以便对新时代的一切创造性的活动提供有益的援助。但是，如果鑽进去的人过多，特别是鑽进去而不知道跑出来的人过多，成为一种流行的学风，这就成为问题了，这就不妥当了，这就不好了。

资产阶级制度被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可是，资产阶级的学风和习惯还残存下来。在历史研究的问题上，这种影响格外明显。

毫无疑问，在整个学术文化领域中，应该有各种专门的工作。单从社会科学来说吧，一部分人可以着重研究现状，一部分人可以着重研究过去；一部分人可以着重从事理论性的探索，一部分人可以着重从事资料的搜集，文献的整理，工具的准备，外国著作和古代著作的翻译，名物的考据，版本的校勘。我们的学术文化工作是多方面的，是很复杂的，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做同类的工作。大家知道，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一些人在做，并且有一些工作进行得不坏，作了有价值的贡献。问题是现在学术界中有些风气是否完全适合于学术文化工作向前发展的利益，是否完全适合于进行理论性、创造性活动的利益，也就是说，是否完全适合于新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利益。

有些人说：要接受历史遗产、文化遗产吗，很好，我们就是拥有历史遗产、文化遗产的人，你们就照我这个样子办吧。这些人在旧书堆里鑽来鑽去，往往对一些并不重要的事，甚至一个简单的字，也不必要地、不相适应地用了很长时间去考证，几个月，甚至几年，还可以把这些烦琐的考证写出许许多多的文章和一本又一本的书来，不但他们自己以此乐而忘反，而且影响一些青年也跟着一起乐而忘反。马克思主义者为要说明或解决问题，为要探讨某种历史的规律性，丝毫不反对必要的考证；相反地，倒是认为必须掌握大量的材料，做许多严格的考证。而且，只要有需要，对于某一个字，某一件事，



馬克思主義者也並不反對給以周到的考證。但是可惜，我們的學術界中有些人却不是引導自己或別人去認真地、有系統地進行研究問題，不是引導自己或別人去對於具體的歷史現象或歷史事變，從事具體分析的艱苦研究工作，而只是引導自己或別人去做那些並不能說明什麼社會現象或歷史事變、而且連他們自己也說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用處的考證，從而浪費自己和在他們教育下的青年人的許多有用的精力。

我們很需要以唯物史觀為指南，重新系統地研究中國全部的历史。可是，有些人却只啃着某些舊書里面的個別材料，甚至只在個別字面的看法上，也可以無休止地爭論下去。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法德文版序言中說過：“因為社會生活現象極端複雜，隨時都可以找得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証實任何一種意見”（“列寧全集”第22卷，第182頁）。我們有些歷史工作者的偏向，恰恰是這樣：他們愛在個別的例子、甚至在個別的字句間轉圈子，去證明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在進一步地努力，用長年累月的工夫，去引用關於一定時代整個社會生活的材料的總和。這種做法，希望得到科學的結論，不就很難很難的嗎？是不是可以說，這種做法，主要是屬於瑣屑主義的興趣；在實質上並不是科學的興趣？

解放後各少數民族給社會科學工作者提供了關於研究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和農奴社會的極豐富的活生生的材料。憑藉這些新材料，就有可能使人們在恩格斯的“家族、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之後，寫一部或幾部人類社會發展史的新續編。有些研究機關，有一批研究工作人員，在搜集這些方面材料的工作上，是辛勤而有成績的。就我看來，如果有人能夠再進一步地去利用這些材料，象恩格斯和摩爾根那樣去進行研究工作，其結果必將大大豐富我們的歷史知識，幫助我們在研究漢族歷史的問題上開闢新的眼界，使我們研究全部漢族歷史的工作更容易進行，或許還可以設想，這種研究甚至能夠使唯物史觀的內容得到某些新的補充。我們只要讀讀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一八八六年英文版附注中對於摩爾根著作的估計，以及恩格斯在“家族、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怎樣注意利用摩爾根著作中的材料，那末，這後一種設想並不是毫無根據的。並且，進行這樣的 research，使人們不可避免地將會繼續引出全國各族人民必須為社會主義事業而鬥爭的結論，因此，這種研究工作不只有學術價值，還具有現實鬥爭的價值。但是可惜，我們的歷史科學工作者似乎還沒有充分注意、也似乎沒有人認真地着手去做這種研究。對於老文獻的枝節考證興趣很濃厚，而對於各種活生生的材料、包括象少數民族這樣的材料的研究興趣不足，這或許也是“厚古薄今”表現的一種形式吧。

也有些人，他們倒不去搞許多瑣屑的考證，却是在繼承歷史遺產、文化遺產的名義下，在玄虛中繞圈子，把古代加以現代化，把現代加以古代化。例如馮友蘭先生曾經提過所謂“抽象繼承法”，在實質上就是這樣。他在最近所作的“四十年的回顧”，已經對這點作了自我批評。我們歡迎他這個進步。但他原來那種思想，並不是只屬一個人的，而



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我还可以在这里說一說。他提出的所謂“抽象繼承法”，其中有些个别論点是可以討論的，但是它的根本內容是錯誤的。他認為，古代留傳下來的許多遺產，哲學史上、道德史上的許多概念，它們的抽象意義是不變的。或者又如他後來所說，它們的一般意義是不變的。他想剝奪哲學、道德的概念中的具體內容，使這類概念成為超客觀存在、超時間、超歷史條件的某些絕對的、先驗的形式，公式，或名稱。他的所謂繼承，就是把它們現成地拿來。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如列寧所說，一般只能在個別中存在，只能經過個別而存在。或者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即包含于一切個性之中，無個性即無共性。實踐告訴我們，一切正確的概念，科學的概念，都是從具體事物出發，而又回到具體事物。具體事物是概念的出發點，又是它們的終點。各種概念都是反映一定的相同事物的存在。概念反映具體事物間的聯系和聯結，反映事物的多樣性的矛盾的統一。離開具體事物，就無從進行正確的抽象，就沒有什麼抽象的概括，就不能夠構成什麼正確的概念。但是，從馮友蘭先生原來的說法看來，具體只能在抽象中存在，只能通過抽象而存在。這就完全顛倒了。抽象變成主體，具體變成從屬和派生的東西。於是，不論古今，任何哲學派別，任何階級道德，似乎都要屈服在馮友蘭先生的所謂“抽象意義”或“一般意義”的支配之下。這樣，也就可以方便地去磨平唯物論和唯心論的界綫，磨平這個階級道德和那個階級道德的界綫。在這種所謂“抽象繼承法”里面，倒真正有它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呢？那就是蘊藏着一種具體的復古主義，即企圖經過某種形式保留中國歷史上的唯心論體系，企圖把中國封建時代統治階級的一套道德都當作永恒不變的道德。

有所繼承，必有所否定。我們要繼承什麼，否定什麼，那都是具體的。比如我們繼承唯物論，就要否定唯心論，能說這種繼承和這種否定都是抽象的嗎？列寧說過：“兩千年的哲學發展過程中，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鬥爭難道會陳腐嗎？哲學上柏拉圖的和德謨克里特的傾向或路綫的鬥爭難道會陳腐嗎？……”（“列寧全集”第14卷，第128頁）列寧又說：“最新的哲學象在兩千年前一樣，也是有黨性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按實質來說，是兩個鬥爭着的黨派……”（“列寧全集”第14卷，第379頁）古今中外，哲學上兩條路綫的鬥爭和這種鬥爭的黨党性，具有普遍性。難道哲學史上繼承下來的這種兩條路綫的黨党性的鬥爭，在現在是抽象的嗎？在中國，比如說吧，從古代哲學史上一直繼承下來的關於名實關係問題的鬥爭，這是抽象的嗎？你所繼承的，或者是存在決定思維的觀念，實決定名的觀念，於是你就成為唯物論者；或者是思維決定存在的觀念，名決定實的觀念，於是你就成為唯心論者。繼承正確的東西是具體的，繼承錯誤的東西也是具體的。怎樣能說這些是什麼“抽象繼承”呢？

“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體的”。哲學上的真理，一切科學上的真理，都是這樣。道德上也是這樣。難道階級社會中各階級的道德是抽象的、超階級的，而不是具體的、階



級的道德嗎？

所謂“抽象繼承”，實際上是把概念孤立在具体事物之外，把概念同具体事物对立起來，否認概念是在人們認識客觀事物的過程中逐步形成和逐步發展起來，否認反映客觀事物和歷史發展的概念本身的变化，否認概念的具體性。因此，什麼“古已有之”呀，什麼“古今是一樣的”呀，就是這種所謂“抽象繼承”論必然引出的結論。這種“抽象繼承”論只能引向“頌古非今”的道路。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必須把各種不同遺產的性質區別出來。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我們應該把它們區別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要吸收精華，排除糟粕，“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當我們說繼承是具體的，也就是說，我們對於繼承，是帶批判性的。繼承和批判，是對立的統一。馬克思主義所以是偉大的創造性的科學，因為它是批判的、革命的學說；因為它不是簡單地繼承前人的遺產，而是對於前人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學說，都作了深刻的批判和革命。恩格斯曾經這樣說過：“如果先前沒有德國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那末德國科學社會主義，即自古迄今唯一的科學社會主義，便永遠不會創立起來。”（“德國農民戰爭”一書序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1卷，第627頁）但是，科學社會主義同黑格爾哲學的關係，也正如馬克思自己說的：“我的辯證法，在基礎上就不只與黑格爾的辯證法不同，並且是它的正相反對。”（“資本論”第1卷，第17頁）馬克思對於費爾巴哈的唯物論，也是有批判的繼承。在政治經濟學方面，馬克思的偉大著作“資本論”的副題，就是叫做“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批判空想社會主義、批判形形色色的各種反動的社會主義流派的鬥爭中，揭起科學社會主義這個偉大旗幟的。

大家熟知，列寧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學說的各個戰綫上，繼續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偉大事業，做了許多極其博大精深的批判的、革命的創造性工作。列寧在反對民粹派、經濟派、孟塞維克、經驗批判論者、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托洛茨基派以及各種“左”傾機會主義者等等的畢生鬥爭中，大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推進到新的階段。

我們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一系列著作中，在接受了中國前人各種優秀遺產的同時，同樣也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批判的、革命的態度去對待各種遺產。

在十九世紀末年，列寧在他同俄國民粹派爭論的“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產？”的著作中，對於馬克思主義在繼承和批判這兩個方面的相互關係，作了很精闢的概括。他區別當時俄國有兩種不同的遺產：“一種遺產是一般啟蒙者的遺產，是對改革前的一切東西採取絕對敵視態度的人們的遺產”；“另一種遺產是民粹派的遺產”，是“寧肯停滯”、“寧肯讓農民繼續停留在自己陳旧的家長制的生活方式之中”的遺產。同時，他又說：“學生們（指當時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較之民粹派分子是徹底得多、忠實得多的遺產保存者。……但是不用



說，‘學生們’保存遺產，並不象檔案保管委員保存舊紙那樣。保存遺產，並不等於局限於遺產”（以上引文均見“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產？”，195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0、50、52頁）。總之，第一，馬克思主義者要區別遺產中的精華和糟粕；第二，馬克思主義者既要有繼承，又要有批判。

在兩條戰綫上進行鬥爭：一條戰綫是反對右的復古主義。這種右的錯誤傾向是：只要拾古人的余唾，認為凡古皆好，加以膜拜，而否認正當的批判。一條戰綫是反對“左”的幼稚病。這種“左”的錯誤傾向是：把批判當作抹殺一切、割斷歷史的粗暴的簡便手法，用現代革命無產階級的标准去要求和責備古人，把過去的歷史看成錯誤的堆積，而否認對人類文化遺產的繼承。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兩條戰綫上的鬥爭是正確的，因為馬克思主義者總是歷史地看待一切，根據各種事物出現的具體歷史條件，它們包含的具體歷史內容，進行具體的分析。即使是遺產中的精華，如舊唯物論，朴素辯證法，各種帶有某種進步性的思想和文化，也都是歷史地看待它們，承認它們在歷史中所應得的地位，分別它們里面的正確部分和錯誤部分，既不誇大它們的作用，也不縮小它們的作用。歸根到底，是在於鼓舞人們向上的創造力。

隨便引用中國歷史上的兩個例子來說。唐朝韓愈是在文體上進行創造性的革新者；他的主張是：“惟陳言之務去”。清初顧炎武是一代學術風氣的開闢者；他認為：“文章之病，全在模仿。”他還進一步主張：人們要著書，“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為之。”在這裡，我不想說到他們所達到的造就的問題。他們都是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對於他們造就的看法，不能離開他們當時所處的歷史條件。我在這裡想說的，是這樣的事實：一方面，他們都力求精通古文、古書；另一方面，他們所以能夠有某些成就，就是因為他們學生下過苦工夫，而在一定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傳統的束縛。

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歷史上那些有或多或少創造性成就的，也都是或多或少不受傳統束縛的。

解放了的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除了失掉帝國主義和舊社會的鎖鏈以外，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失掉。歷史上有過的精神解放，再沒有什麼可以比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解放的時代更徹底的了。而且，在解放後，全國社會生活所提出的問題，同樣是前無古人的。“厚今薄古”的提法，實質上是反映了這樣的解放和解放後的這個新的局勢。

但是，一定的口號和公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象上面所說的種種內容，就不能完全由“厚今薄古”這樣簡單的口號充分表達出來。曾經出現過有人把這個口號加以簡單化和庸俗化的偏向，也發生過一些誤會，例如，似乎以為考古不必要了，古代歷史的研究不必要了，古書的校勘和注釋不必要了，古書今譯的工作不必要了，從事上述這些工作的老專家需要改行了，在學校里也不必給學生以必要的歷史知識，也不必讀古典作品了……如此等等。我原先沒有把問題說得很清楚，這是要由我負責的。



无论如何，实践是第一，实践是一切方针、口号的试金石。既然一定的口号、公式都不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我们只在这个“厚今薄古”口号上空空洞洞地尽说尽谈下去，对于中国学术文化并不会增加一些什么。我们想望的，就是要有一批一批的人真正能够好好地去做。而果真这样，也就会经过一段时间而出现许多出色的新成就。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的整风报告中说过，“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5页）逐步克服这个矛盾，是我们整个理论战线上、科学战线上的任务。这个任务要求我们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付出很大的精力。在科学上拣便宜，此路不通。想在这里一下子成名，想搞些什么投机，想赶些什么“时髦”，这就根本打错了主意了。必须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搞清楚一件事又一件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上说过：“在科学的入口处，好比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在科学面前，就是必须有进地狱那样的勇气。前人有过一副对联，联文是：“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用我们的话来解释：我们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战士，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满怀洋溢着战斗的乐观主义，这叫做：“心中别有欢喜事”。但是，要实现我们的目的，必须经历一系列曲折的道路，并且，必须夺取科学的堡垒，而夺取科学的堡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堡垒不容易夺取，小堡垒也不能轻易夺取。这又叫做：“向上应无快活人”。谁以为随便找一两件材料，说些空话，就能成为一个科学家，就能成为一个有贡献的人，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科学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应该以工人农民做自己的模范。工人造一个工具，造一所房子，农民种粮食和各种作物，都要有一系列的艰苦的劳动。任何生产成果都不是轻易取得的。对前人劳动的经验，在没有经过具体的分析、没有取得新证实的经验之前，也不好随便抛弃。剥削阶级是不劳而获的，但在历史上，一切科学家，一切有学问的人，是没有不劳而获的，没有不经艰苦劳动而能有所成就的。孔子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所谓“生而知之”，根本上没有这回事。孔夫子是封建时代的教育家，他也不承认自己是“生而知之”。世界上从来没有“生而知之”的科学家。那有不学，不困，而成为科学家的？当然，也不会有人因为只在厚今薄古这一口号上背得非常烂熟，而一旦忽然成了科学家。

我想，真正厚今薄古，真正看重现实的问题，看重各种还没有解决而正待解决的问题，就要认真看待学问的工作，而在工作上不会觉得是“轻松愉快”，而会觉得是一种很沉重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最现实的、最需要我们去解决的问题，总是较复杂的问题，总是较困难的问题，总是要求我们付出更大力量去反复研究的问题。思想有了一定的结果，可以有些“轻松愉快”，但在有“轻松愉快”之前，会有一个痛苦的过程，一个难产的过程。要研究一件事，必须经过很苦的思索。“皇天不负苦心人”。任何一个人肯劳动，



总会有结果，大结果或小结果。苹果有大有小，小苹果也是苹果。可以有苹果，可以有小苹果。无论如何，付出了劳动，就会给我们一个代价——一个果实。

否认条件，那是一种简单的想法，一种错误的想法。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要求正确认识各种具体的条件，正确利用各种有利的条件。比如拿学问这件事来说，你要得到学问，就需要有一定的条件。肯劳动，继承中外前人的成果，向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先进国学习，这些就是条件。我们要向科学要东西吗？当然可以。有多少劳动，科学就会给多少东西。不经过艰苦的劳动，想成为科学家，科学就会关起门来，不让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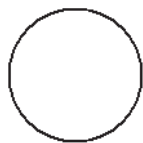
大家都知道西游记上孙悟空吃仙桃的故事。据说，吃了仙桃，就可以长生不老。孙悟空是经过锻炼，经过奋斗，才能够到天宫吃到仙桃的。我们要吃科学的仙桃。但是，如果没有下苦工夫，没有艰苦的奋斗，从那里去得到科学的仙桃呀？

恩格斯给史密特的一封信，可能大家读过。可是，好文章不厌百回读。我们不妨再读一读。恩格斯在信上是这么说的：

“一般说来，对于德国许多青年作家，‘唯物主义的’这个形容词不过是一个套语，他们用这个套语去处理各种事物，再也不花什么气力去作进一步研究，也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一切都解决了。然而，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个进行研究的指南，而不是一种用以按黑格尔学派方式构造体系的手段。全部历史都应该开始重新研究。首先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生存条件，然后才可试图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至今都还很少作出什么东西，因为还很少有人认真作过这点。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领域极为广大，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有很多的创造、获得卓越的成就。但是，在许多青年一代的德国人那里，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须知，经济史还只在襁褓之中呵！）尽速构成系统，而后自豪地欣赏自己的功业。”（《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487—488页）

恩格斯这些话是在一八九〇年八月针对德国一些青年作者的情况而说的，离开现在快近七十年了，但这些话也象现在对我们说的一样。在解放了的中国，不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需要我们研究的领域，真象恩格斯所指出的，是无限广大，谁只要肯认真地去做，就可以有很多成就，就能够出人头地。可是，直到现在，我们也还有些人总是想把“唯物论”几个字象标签一样贴来贴去，而有系统地认真努力和刻苦工作却嫌不足。事实上，我就很担心有人会把“厚今薄古”这个口号当成一种“时髦”的空名词，把它当成一种概念的游戏而了事。

我觉得我们应该记忆并重新温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候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同志在那些著作中告诉了我们搞学问的基本途径。其中有两句话需要引起我们经常注意，这两句话就是：“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



附录：厚今薄古，边干边学

（这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會議上的講話，以前报上发表过一个摘要，現在发表的，是經本人略加整理过的记录稿。——伯达）

今天講的题目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

一年以来，思想战綫和政治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在科学界取得了胜利。右派在群众中被孤立了，中間的向左轉。在学术界中情况很清楚，归根到底：或者是人民的朋友，或者是人民的敌人，中間道路是没有的。現在在工厂、农村里，人人在談跃进，大家在努力爭取我們的事业的跃进，这是在思想战綫和政治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的新的革命气氛。

有人問：科学界要不要跃进？能不能跃进？如何跃进？既然我們的国民經济都在跃进，如果中国科学界不跃进，那不是脱离实际太远了嗎？思想要反映社会的存在。跃进是可能的，是必要的；問題是如何跃进。一个题目可以写許多文章。科举时代，一个题目就有几千人应试，做出不同样的文章。对于“如何跃进”这个题目，大家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文章，我今天做的是其中的一篇。

在我看来，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虽然还是落后于革命的实际，但是八年多来成績还是主要的：有一批新生力量正在成长；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很活跃；报刊上有不少好文章——馬克思主义的文章；资产阶级知識分子中有相当一批人已經轉到或者靠近工人阶级这边来了，在学术資料的搜集上也是有成績的。所以应当說，我們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虽然落后于革命实际，成績还是主要的，并且正在进步中。

为了更好地前进，要能够看到我們的缺点，并且努力改正这些缺点。我們在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上的缺点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的缺点之一，就是“言必称三代”的煩琐主义的学风相当盛。有些人对于当前现实生活中的問題似乎不感兴趣，很少去研究，而对于过去的事情，几千年前的东西，討論得津津有味。历史是不是需要研究呢？当然是要研究的，但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充实我們的知識，而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有助于解决现实的問題。如果为历史而历史，为三代而三代，那就势必陷进无穷无尽的煩琐的考据、猜测和假想中間。煩琐主义，迷恋古代，这是资产阶级遺留下来的风气。胡适就是如此，鬧了一下白話文，就去搞“国故”去了。在全国解放后，有一些资产阶级知識分子想逃避现实，脱离实际，脱离社会生活，把自己藏到“三代”的角落中去，把“三代”当作“象牙之塔”。这当然不是无产阶级的风气，不是馬克思主义的风气。



我想引一段馬克思对于思想工作的根本看法的話。他說：“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來說，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頁）我們現在一些哲学家的文章就沒有做到这一点。离开社会主义大革命、大建設的时代生活，就不能表現我們时代的精华，就不是战斗的馬克思主义。

在喜欢研究古代的人里面，有些人以为，古代的問題，人都已經死了几千年，要怎么講，隨便你，不受約束。这种态度是不严肃的。当然，死人的問題多得很，有些問題或許是搞不清楚的，而且也不值得我們去把它們搞清楚，即使搞清楚那些問題，博得死人点头，并不能幫助我們科学地了解历史的真象，更不能幫助我們解决当前现实問題。对于我們所必須搞清楚的历史問題和现实問題，要能真正搞清楚，都必須認真地花一番气力，不花气力是不行的。作为馬克思主义者，要向哪一个方面进攻呢？要攻最困難的問題，不要去攻那些得不到結論、而且得了結論也沒有什么用处的問題。

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不做考古的工作。恩格斯就考过古，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个著作。恩格斯研究古代社会是为了闡明历史的发展过程和发展方向。他的这种研究具有巨大的科学意义，也具有现实的斗争意义。可惜我們有不少文章，远不是这样。我們应当和“言必称三代”的煩琐主义的风气作斗争，扫除这种不好的风气。否则，它就会堵塞住我們馬克思主义前进的道路。

我們是人民的战士，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我們應該面对現在，厚今薄古，而不是厚古薄今。现实的問題應該是我們研究的主题。从现实的問題出发，对于古代的問題也更好解决了。沒有研究資本主义社会，或許恩格斯也很难写出他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馬克思講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鑰匙。在下等动物身上所透露的高等动物的征象，反而只有在已經認識了高等动物之后才能理解。資本主义經濟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政治經濟学批判”，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7頁）这就是說：对于資本主义社会的認識，給了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提供了一把鑰匙；有了关于現代問題的科学知識，对于古代的問題就更容易了解了。我們懂得了現代，就会更清楚地知道應該如何去研究古代。这是一个方法問題。

我們是不是可以作这样一个建議：对于整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力量的布署，在哲学、經濟、历史等等学科，應該着重研究现实的問題。古代的問題，要研究，还要作專門的研究，还要出一批專門家，但應該是在唯物史观总方向的指导下从各方面来作有系統的研究。研究古代也要有明确的目的性。孔夫子說过：“温故而知新”。“温故”也有个目的，目的是了解新的东西。連孔夫子都知道这个道理，如果我們馬克思主义者反而不懂，这就太說不过去了。

至于学校中的教学，当然必須按照学生增长多方面知識的需要，逐步地使學生們学得必要的历史知識，获得必要的文化修养，而因此，教師們需要在自己教授的功課上，



尽可能地進行關於這些方面的充分準備工作，那是不用說的。

我們說，那種無目的的、煩瑣的歷史研究應該有個根本的改變，但是歷史學家並不會因此而“失業”。對於我國歷史的真正的科學研究還是很少；我國的古代歷史和現代歷史都需要認真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八年多了，每年都可以寫編年史。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還都沒有人認真地去寫。如果要寫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應該研究一下三反五反運動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運動中所提供的材料。寫一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對於當前人民的教育，就很有好處。

學術要為一定的時代、一定的階級服務，要表現了那個時代，才能對那個時代起積極的作用。就是說，我們的學術界不要總是面對古代，背對現代和將來，要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認識中國人民鬥爭的新面貌，認識中國全局的新面貌，認識中國和世界關係的新面貌；要對於中國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建設所出現的一系列新問題，新經驗，用唯物辯證法的哲學思想，在各个方面，在哲學上、政治經濟學上和歷史科學上，作出新的概括，使中國的學術成就大大地高出過去中國一切歷史時代的水平。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厚今薄古。這樣，社會科學的發展就會對新中國的建設、對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起積極的作用。

以下講第二個問題，即邊干邊學。

在這個問題上，我想引用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的一段話。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革命隊伍內部對於如何學習戰爭，有爭論。有人說，戰略戰術在書本上有，只要從書本上學。毛澤東同志不同意，認為主要地是從實踐中學習。他說：“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沒有進學校機會的人，仍然可以學習戰爭，就是從戰爭中學習。革命戰爭是民眾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干，而是干起來再學習，干就是學習。”（“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79頁）這就是當時的內戰問題而說的。但是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這個方法問題有普遍性的意義。不論是對於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邊干邊學這一條都適用。

似乎有這樣一種說法：你沒有進過大學，留過洋，得過博士學位，也不是國際上的名教授，搞什麼學問呢！有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瞧不起老干部，也瞧不起新幹部，大模大樣地看待學生。在某些方面，他們的學問可能很不少，但是他們沒有想到：古今中外沒進大學，沒出過洋，沒得過博士學位，而很有學問的人也很多，有的連小學中學也沒進，還是發明家。進過大學得過博士學位的人，當中有很多人是有學問的，如在座的就有許多；但是，這不等於一切進過大學、得過學位的人都有很大學問。過去考狀元，狀元的卷子，沒有幾份流傳下來的。有學問的狀元是有的，但是可以說有很多考上狀元的人也不一定學問，而許多“無名小卒”卻在實踐中得到很多的學問。

共產黨員是行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八年來，我們一個勝利接着一個勝利。沒有一批具有相當水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員，不可能在我們這樣一個大的國家里領導



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有许多是在行动中学习的。当然，共产党员都应当继续边干边学，继续在行动中不断地努力学习新的知识，新的本领，不断地提高自己。

任何人都应当有自知之明。即使有了一些成就，但同中国人民翻天覆地的成就比较起来，同一些伟大的科学家比较起来，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孔夫子说得不错：“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我们共产党员应该谦虚，不然，这个共产党员就很难有什么出息。我们应该尊重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在科学的面前，采取傲慢态度，是不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谦虚，是不是希望很大呢？当然也不是。谦虚有好处。客客气气，口头上讲讲我不行我不行，并不一定是谦虚，或许只是虚伪的“谦虚”。我们要说的，是实事求是的谦虚，是科学的谦虚。什么叫谦虚呢？谦，兼也，就是要避免片面性。所谓虚心，就是要让头脑腾出些地方，不要自己装得满满的，外面的东西才进得来。“心”（就是指我们说的头脑）如果不“虚”，而是塞得满满的，外面什么东西都装不进去，这个人还能希望得到什么新知识呢？我们共产党员有必要谦虚，一切知识分子也有必要谦虚。中国人民做出了多么伟大的成绩，而我们学术界做的成绩实在太少了，我们要赶上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跟着人民前进。

自卑是另一种错误。我们许多老干部、新干部、知识不多的人，在求知问题上，并没有什么悲观的理由。我想，任何人只要肯努力，就不必悲观。郭沫若同志在“金文丛考”一书的“重印弁言”中，介绍了自己写书时的一种心情，就是要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胡适之流挑战。他说：“我要向谁挑战呢？我准备向搞旧学问的人挑战，特别是想向标榜‘整理国故’的胡适之流挑战。从前搞旧学问的旧人，自视甚高，……因此，我想搞一点成绩出来给他们看看。结果证明：所谓‘国粹’先生们其实大多是假古董。”郭老提到胡适时，又说：“这位标准的买办学者，你看他是怎样盲目而无知！因此，我就准备拿点他们所崇拜的‘东西’来‘打’这个狂妄的家伙。结果呢？我们今天也已经看得很清楚，那自称‘有东西’的家伙究竟有的是什么东西了！”看来郭老这段话，到今天还很有意思。右派向我们挑战，我们还要向他们挑战呢！右派他们有什么东西！我们边干边学，几年来学得并不算慢。右派说今不如昔，说过去多好，“胡适文存”一本又一本。郭老拆穿了这类假古董。我们还应该经过认真的研究，继续揭穿一些在人民面前大摇大摆的假古董。

凡是在人民面前翘尾巴、藐视人民的人，人民就有权利藐视他。其实，那类人也不会在学术上有什么真正的成就。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但是在前进中。“谁笑在最后，才算笑得最好。”事实上，笑我们的人并不一定有学问，或者根本没有学问。而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进步一定是很快的。

历史证明，凡是共产党员想学的东西，凡是真正为人民服务而百折不挠的人想学的东西，任何堡垒都是可以攻下来的。对自然科学如此，对社会科学也如此。在最短的历史时间内，在共产党员和党外许多学术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学术工作，一定可以跃进。

